独立阅读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10年08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 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 <u>shrbooks@gmail.com</u>,浏览最新信息可登陆豆瓣"独立阅读"小组: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 6、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执行编辑: 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孙骁骥、扬克、灵子

轮值编辑: 灵子

化阻拥押:火丁

观察员: 文学:朱 白(广州)、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 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 王晓渔(上海)

艺术: 言 一(成都)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骁骥(北京)、贾 葭 (北京)、张无极(北京)、罗四鸰(上海)、扬克(德国•图宾根)、孙 传钊(上海)、燕舞(北京)、灵子(北京)

翻译: 吴万伟(武汉)、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编者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夏天变成最残酷的季节。犹记得去年此时,邓玉娇案、石首案、通钢事件,种种现实撕扯着人心。 今年更甚。南京化工厂爆炸、大连海油污染、栾川大桥塌陷、全国洪灾不断、甘肃泥石流吞人……几乎每一天打开网页,都 面对一个崭新的灾难世界。

在动荡的环境里,拿什么来抚慰人心?何等动力能驱使自己继续向前?也许,知识是一种,宗教是另一种。我们试图通过知识建立清晰的认知体系,以看清混乱世界的背后究竟是如何运转;也因越来越多的知识而感到多出几倍的无知,在必然存在的黑暗和缺陷面前,期求领悟生命的圆满,守护个体的安宁。

个人的选择诚然难以改变整体的荒谬,即便再怎样醉心书画、电影、音乐,也免不了打开电视迎面扑来的"反三俗"运动。所幸还有少数的理想主义者在坚守,无论历经坎坷的老出版人,还是带着锐气的年轻作家,总有一些人愿意跳出逼仄的现实空间,站远一点,低头工作,等待未来。

乐山疑似出现三个太阳的消息,使人不禁联想到科幻小说《三体》中的宏大构想或将成真。在光怪陆离的现实面前,科 幻已经失去想象力的优势。换一个角度说,现实亦是科幻。若能把现实世界看得疏离一点,统统当做科幻小说来看待,倒也 可以免除些徒劳的恐惧和焦虑。

在全国高温逼近四十度的酷暑里,所幸还有阅读这面巨大的盾牌,使我们得以一起躲避在知识与神性的光芒之下。

来函:

在"独立阅读"**2010**年7月号上读到王晓渔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及想寻找郭永胜著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一书。我在网上偶尔发现下面这个地址可以下载——不知道是不是那本书。

<u>http://ishare.games.sina.com.cn/f/6605638.html</u> ,该文件是 NH 格式,据说用 CAJveiw 软件可以打开,下载该文件 需要积分,只需注册一个新浪账号即可(赠送 5 分)。

Steven

感谢 Steven,同时感谢 Jie Lv、涛涛、Chen Shi 等读者提供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一书有关的信息。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 济: 苏小和

写 作: 朱航满

思想:成庆

文 史: 王晓渔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孙骁骥: 注了水的猪肉, 毕竟还是猪肉

书评

孙传钊: 非常时期的大学行政化(之一)

王晓渔: 建国大业美国版

逝者

音乐

马慧元: 管风琴音乐会琐记

电影

言 一: 当我们谈论城市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访谈

灵 子: 科幻的使命是创造一个公平自由的世界——韩松访谈

译介

保罗•伯曼: 监狱知识分子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ECONOMY 经济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新书推广,我出去做了几次演讲。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名诗人竟然可以去喜欢经济学,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我每次都回答,诗歌和经济学都从个人出发,都在关心人类的福祉,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具体的财产权、知情权和自由迁徙权。我还继续说,假如一名诗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权利,我基本可以认定,他并不了解人性,不了解人的幽暗,也不了解一个具体的人,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当然,这样的回答,依然模糊。好在独立阅读的生活,能为我们找到史料意义上的佐证。我想提到的第一本书,是赖建诚先生的著作《梁启超的经济面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赖先生说,在将近一世纪之后重读梁启超,还是能感受到梁任公的文笔力量,文人的情怀跃然纸上。需要指出的是,很多读书人知道梁启超的知识分子情怀,知道他力主改良,努力传播西方文化,曾经说出了太多的中国问题,但并不知道他曾经在民国3年,也就是1914年担任币制局总裁,民国7年,



也就是 **1918** 年担任过财政总长,在如此具体的经济领域,梁任公一样显示了他的 热意与沉痛,他的激切与关怀,赖建诚先生认为任公在这里甚至有"愿意和魔鬼对 决"的姿态。

许多年之后,我们回头看梁任公的财经主张,他主张币制改革(采取金本位)、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土地国有论,简直像一个时代的先知,提前发出了正确的预告。遗憾的是,像他的改良观点一样,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几乎没有重视梁任公的声音,野蛮的暴力、愚蠢的公有制发展到极致。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之中所有个人的生活由此被摧残,被践踏。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文化人,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工人,所有的农民,均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个人幸免。

前年集中写人物志,写到了梁任公的儿子梁思成。发现即使是儿子,也不赞成父亲的经济主张。在关于北京市的改造问题上,他认为城市建设必须要有通盘的计划与设计。梁思成从自己的规划与建筑本行出发,朴素的认为土地公有制比土地私有制更好,相信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统一管理。" 而他的父亲梁启超却早在 1906 年就提出了支持土地私有制的观点: "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基上。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或扩张所有权故,循经济法则以行,而不识不知之间,国民全体之富,固己增殖。"(梁启超:《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载刘军宁编:《北大传统与近代

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某种意义上,忽略私人财产权,给梁思成几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他一辈子的北京古典美学灰飞烟灭,他作为一个建筑学家的方法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价值观,都被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彻底摧毁。1949 年之后,梁思成的个人史几乎就是一部处处退缩的历史,他试图退缩到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中国建筑美学之中。可是历史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只允许他退到宏大的国家意识和强势的共产潮流中去。我记得他晚年的忏悔:"我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党是不懂建筑的,因而脱离了党,脱离了群众,走上错误的道路。党领导政治、专家领导技术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党对技术的领导是丝毫无容置疑的;"记得他临终前,对女儿梁再冰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我们更记得1952 年的许多傍晚,他一个人徘徊在北京正在拆毁的城墙下,守着那些残砖断瓦哭泣。这就是梁思成,一个没有自由经济思维和权利意识的美学家,最后一名为古典北京哭丧的人,一个在家国意识和古典审美中左右奔突的迷路人,一个让我们热爱、让我们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

梁思成先生的命运由此成为一个现代读书人必须要参考的案例。为什么必须要重视人的私人权利,必须要守住人的私人

场域?似乎一旦私人权利失守,不仅一个人具体的生活遭受打压,连他的艺术审美生活,也会被格式化。这里其实隐含着最基本的追问,即幽暗的人性追问。每个人的自私性,既是这个世界的缺陷之所在,也是这个世界运转的基本动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审美生活,都必须而且只能从人的幽暗性出发。友人余杰先生的书《白昼将近》(晨钟书社,2008年4月),集中了他这些年的信仰与中国问题的思考,通篇读来,明显感觉到余杰努力认识神,认识自己的思考历程。远在美国的远志明先生对余杰的思考倍加赞赏,并欣然作序。远先生的有一段话,于我心有戚戚:

"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一种个人关系,上帝若不在我里面,他就不在任何地方,上帝若在我里面,他就无所不在了,所以信仰是个人的私事。"

一名领悟到神的美意的读书人,必定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最终回到个人主义,神对人的确定,事实上才是个人主义真正的源头。这里我要隆重提到张灏先生,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就是这方面的大好著作。沿着文史的路径,追问人性,并推及历史的思辨和当下的困境,张灏先生的确是集大成者。张灏先生祖籍安徽滁县,这样的籍贯让人眼热,安徽为什么才子辈出,的确有某种神秘的因素。从胡适之、唐德刚,张灏,这样的风景让人流连。

余杰曾经在张先生的寓所里和先生有过通宵常谈,后来余杰整理出来的访谈录,令我记忆深刻。在张灏先生看来,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而清教徒的互约论,正是基于人的缺陷,靠两重互约建立人的社会。首先是人与神之间的互约。一方面人保证服从神意,谨守道德;另一方面,基于人的承诺,神保证人世的福祉和繁荣,在这人神互约之下,人们彼此之间又订下了进一步的信约,言明政府的目的乃是阻止人的堕落,防止人的罪恶。在这一大前提下,政府的领袖如果恪遵神意,为民造福,则人民接受其领导,若他们不能克制自己的罪恶性,因而违反神意,背叛信约,则人民可以起而驱逐他,否则整个社会,必获神谴,而蒙受各种天灾人祸。总而言之,清教徒的幽暗意识随时提醒我们: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人人平等。

说到基督徒,我必须要提到司徒雷登,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2010年7月)再一次出版。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多人依然只是记得那篇蹩脚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几个人记得燕京大学?美丽的燕京大学早已被历史的灰尘遮蔽,早已成了读书人内心的忧伤,但爱却一直存在,一直抚慰一个个脸颊清瘦的中国读书人。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追问,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与爱为敌,赶走了司徒雷登,中国就马上可以进入文明世界么?

索性再提一名基督徒的名字,她就是武汉东湖边上的华姿。相信很多人读过她写的《德兰修女传》,我最近读得更多的,是她的另外一本信仰笔记《奉你的名》(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月)。一个优雅的女人丰富的内心风景,靠着虔诚的信仰追问,被华姿美丽的文笔呈现出来。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忽然的喜悦,忽然的悲伤,与持久的虚空,让华姿辗转反侧。生命在武汉东湖边上一条安静的小路上展开,从她的书房,到一朵花之间,华姿听到了神的安慰。我恳切地认为,应该有人去读这本书,尤其是女性读者,尤其是迷恋爱情的女性读者,当男欢女爱缺少了神的眷顾,华姿说,这样的女人看上去像一名惊险的运动员,从一个危险的浪头跳到另一个危险的浪头,女人们总是以为下一个才是避难所,殊不知,只有神的爱,才到永远。





回到经济学吧。最后我要提到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随着我对圣经的进一步了解,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一名真正的自由市场理念的追随者,一定是看到了真理,看到了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只有市场才能捍卫人性,只有市场才能激活个人的创造性,只有市场才能叫人们得自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一定与神同在。宗教叫人死,信仰让人活。越过那些门派繁杂的宗教,直接面对神,你是神惟一

的创造,你和神之间没有中介,你就是祭司,你的劳动就是祷告,每个热爱市场,热爱自由的人,都是蒙神眷顾的孩子。

WRITING 写作

观察员 朱航满 (石家庄, zhm7976@126.com)

一本好书,对于读者来说,是莫大的精神食粮;而对于一家出版社来说,也是一笔太重要的财富。这个感慨来源于近来 到书店里闲来翻书,其中看到北京的三联书店又重新再版了杨绛先生的作品文集,这次重新出版的有《干校六记》、《杂写与 杂忆》、《洗澡》、《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等,都是单行本,由三联书店的蔡立国先生设计,简洁精致,高雅不凡,只可 惜我已经拥有了杨先生数套文集了,对于一个爱书人来说,这真是一种遗憾;同样的遗憾还来自于对傅雷作品的重新出版, 这次三联书店重新出版了"傅雷著译作品四种",分别包括《傅雷书信选》、《傅雷谈艺录》、《世界美术名著二十讲》、《傅译传 记五种》,也是蔡立国先生设计,庄重优雅,简洁高贵,让人喜爱,可惜的是仅这册《傅雷书信选》的其他版本,诸如《傅雷 家书》、《傅雷书简》等,舍下已经有不止一种的版本了,因此只特意购买了由傅敏所编选的**《傅雷谈艺录》(三联书店,2010** 年5月),这倒是以前很少见到的傅雷文选,而我也很想看看作为翻译家的傅雷,在艺术究竟有着怎样的态度和见识。

《傅雷谈艺录》收录了傅雷对于文学、艺术、音乐以及翻译的理解和见识,既高屋建瓴,又一针见血,其中诸如他对于 张爱玲小说的批评、黄宾虹绘画的评论、萧邦音乐的介绍,以及诸多法国经典 小说的翻译心得,都是极为独到的,从其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艺术品评的苛刻与 执拗,以及对于学识态度上的认真与严肃,而反过来,有这些坚实的理论与品 位作为基础,也才可以看出他在对于教育、翻译和写作上的杰出成就的根源。 傅雷的文字意义在我看来,在价值混乱和人心浮躁的年代,这种阅读或许会让 我们内心更多一份坚守的勇气和力量,让我们内心世界更多一份干净与清洁, 而对于文艺写作者来说,傅雷的态度更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精神的参照,正如 他在《读剧随感》中所写到的:"作品不是匠人的东西。在任何场合,它都展 示给我们看作家内在的灵魂。"

在今年的出版界,一个小小的出版现象便是张充和著作的出版。先是年初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耶鲁大学的孙康官女士所编注的《曲人鸿爪》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1版),此书编选了作为"合肥四姐妹" 之一的张充和多年来收藏近现代昆曲研究学者以及爱好者,给作者所题写的书 画作品,同时也从侧面展示了作为昆曲的爱好者的张充和,一生在海外传播中 国文化,在昆曲艺术的研究与实践中所具有的精深造诣。那些原本属于历史岁 月的流风遗韵,通过这册书让我们可以一瞥惊鸿,而一册原本属于文人之间酬 唱的书画文集,也从侧面展示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昆曲艺术的历史,以及东西 方文化艺术在传播流变中的岁月留痕。



因为这册《曲人鸿爪》,我对香港的《张充和题字选集》(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非常感兴趣,在网上曾看到这 册书法集由董桥作序,绿色硬皮封面,设计的古香古色,只可惜购买十分不便;恰好湖北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朋友送我一 册《张充和小楷》(重庆出版社,2002年),让我可以一睹这位才女的书法艺术,此书由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任教的白 谦慎教授所编选,现在已很少见到,朋友也是偶然碰见,便多买了一册。而就在我对香港版本的《张充和题字选集》已不做 奢求的时候,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版了张充和的两部书画集,而且都由蔡立国先生设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为《古色今香: 张充和题字选集》(2010年5月1版),由耶鲁大学的孙康宜女士编注;三联书店的 为《**张充和诗书画集》(2010 年 6 月 1 版)**,由海外著名的书法研究学者白谦慎所编注;尽管两者有所类似,但区别还是明 显的,前者是从人文的角度出发,将张充和的书法艺术作为一种文化角度来进行阐述;而后者更多的则是从书法与绘画艺术 的本身出发的,可以看作是拓展版本的《张充和小楷》,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古色今香》,这是内地 版的《张充和题字选集》。

按 梁 震 掣 擦 廬 库 士 九 君 5 县之 君 輸 名 骆 鮖 先作 台 愈 喽 墨俱當點 雜 後 余 誰 歴 -Z-文 5 是塊劣滅時流章 碧 别 座 為 萨 汝 出 過於不體傳老 裁 未 杜 借 及 竊 蓮廣輕賦更 中 都 君羊 攀 體 見 亦 前 不难 魏江薄不成 以 薄 或 曹 論 親 层 湖為 in 風 更 宋 令 看 P 前雲 詩 オ 風萬 文 雅莫 人 新 發 古 哂 中 宣 督 健 42 カ 方爱翠 充 句 쾢 超 應能法未畏筆 蓝 為 並 古 千口 瀬 難文総休後意 若跨應使尔生縱 3 相 恐 人 13% 沿屋 曹 王 師祖与清上 数 早 \$ 王 身楊令 述感詞未公

抗日战争结束后,张充和嫁给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由此成为美国耶鲁大学的一名书法教师,之后的岁月里,她在异国他 乡潜心书法研究,技艺渐至一流,被学者白谦慎以为有六朝墓志的笔意,端庄又古雅,使中国文化在海外结出奇葩,而同时,张充和也因此幸运地躲避了心灵的磨难,使她没有被污染,依然保持着一颗干净的童心。张充和的题字在我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给自己著述的题字,二是给沈从文先生著述的题字,这里倒是需要解释一下的是,张充和是有名的"合肥四姐妹"之一,其他三位分别为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而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沈从文所娶到的就是张充和的三姐姐张兆和,张充和在四姐妹中排行第四,而她也是与沈从文最有心灵默契的亲人之一,沈先生去世后,张充和在海外为沈先生写下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最后一个字连接起来就是"从文让人",写就之后连张充和自己都颇感惊讶,后来沈从文出版的全集、别集、文集等,几乎都由张先生一一写就,成为出版史上别致的小景;而第三类题写给其他人与单位的书法题字,表面上看来似乎比较杂乱,但仔细研究,便不难发现一个主线,那便是她对于在建立与交流中西文化上给予

了更多的关怀与支持。这册《古色今香》收录张充和多年 来在中西文化交流与融汇方面给予的题字最为多,这便包 括她题字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 中心、欧美汉学家自选集、耶鲁大学图书馆东亚图书馆, 等等,在我看来,那不仅是一种艺术,也不仅是一种风雅, 而更是一种理想,一种寄托,一种乡愁。

最后,我倒是愿意推荐由薛鸿时先生翻译的《**杨宪益自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年 2 月 1 版)**,但实际上这册看似陌生的著作,只是一册改头换面的旧书而已,此书原本是 1990 年杨宪益先生应意大利友人之请而写成的自传《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2001 年在十月文艺出版社以《漏船载酒忆当年》为书名出版,收在该社组



织的一套"百年记忆"丛书之中。遗憾的是,当我很想读这册《漏船载酒忆当年》时,已经很难见到,而这册重新出版的《杨

宪益自传》倒是弥补了这个遗憾。在这册本应充满苦难的记忆的传记之中,我却发现了许多非常幽默和有趣的人生细节,仅举一个例子,当年在重庆,杨宪益与梁宗岱交往,每日相谈甚欢,梁先生嗜酒,每来必饮,但没想到杨先生一天晚上不甚将床底下的一大缸煤油当作白酒倒给梁先生喝,而梁先生不但畅饮且第二天依然渡江赴约,想来真有几许六朝人物的气息了。而对于人生的遭遇,在杨先生的笔下从来也都是风轻云淡的感觉,诸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的遭遇,在此书中就有这样客观而清醒的表达:"……这种异乎寻常的幸福感是不能持久的。在此之后,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次全民关注的变故之中,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违反了党的纪律,最后,经过正常的组织程序,我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其实,作为著名翻译家的杨宪益,在我看来,本质上更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虽然出身富裕家庭,留学牛津名校,与校友戴乃迭结为终生伴侣,一生翻译和出版了大量非常有影响的中国经典名著到异国他邦,但如果不是特殊的历史时代与环境,他的人生可能会完全改写;然而,从一开始,他就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坎坷的道路,从选择在兵荒马乱中回国,到在国家危难中颠沛流离,再到夫妻双双身陷囹圄长达四年之久,如果没有内心坚定的信仰与追求,以及对这信仰不断地反省、煎熬与沉思,那么很难想象,在那些极为艰难的岁月里,他不但能够幸存下来并始终清洁如初,而且对于人生与命运,还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清醒、幽默与达观。

图 2 为张充和书法作品

图 3 为杨宪益和戴乃迭早年合影

THOUGHT 思想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几年前,一个朋友因病去世,但他去世前与我的一段对话却无意间刺激我开始思索生死问题,当时的我,曾试图通过比较基督教、儒家与佛教的生死观来解答心中疑惑。今天回看,那时候的我,大抵上还是接受了王阳明的"生,寄也,死,归也。何悸?",虽然这个答案今天看来,早已无法令人满意,但却让我逐渐扭转了个人思考的主要方向,逐渐有意识地从所谓的"政治哲学"回归到更为基本的"人生问题"上。

这种转变,当然是受到某些人生情境的刺激,其中一个原因,或许就是对"政治哲学"的不满,在今日语境中谈思想和哲学,似乎很容易将任何思想问题与政治扯上关系,这种现世的"政治焦虑感"让有限的"公共空间"里充满了各种意识形态的争论,诚然,在这个时代,我们难以忽略政治的不义与不公,也理应为这些问题鼓与呼。但回到个人的精神生活,政治是否完全就要完全主宰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却是本人长久困惑,且一直不断思考的问题。日常生活离不开"政治"维度,但是政治是否就能囊括、甚至还要主宰生命意义的寻求,则成为我心中的大大问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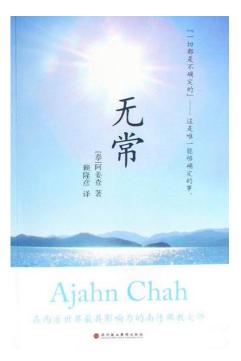
知识人时常会批判地反思这个时代的精神危机,也往往会提出一些宏大的解决方案,但是我常常疑惑的是,这些知识人本身,是否对人生的精神问题已有自己的正面答案,换句话说,指出了精神危机,以怀疑的态度审视各种价值,却不想在个人的精神重建方面踏实且诚实地努力,最终要么表现的只是"于世不合"的悲壮与落寞,要么就落入了"不斗争,毋宁死"的对抗情绪而难以自拔,于我而言,这样的精神世界悲则悲矣,却未必能展现出多少人生智慧。

之所以有这番感慨,原本是有感于如今越来越强烈的"物质主义"倾向,反对这种物欲泛滥并不难,难的是自己能否在 这股潮流中不为所动。要不为所动,道德良知当然不可缺乏,但是更重要的,或许是要彻底了知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 人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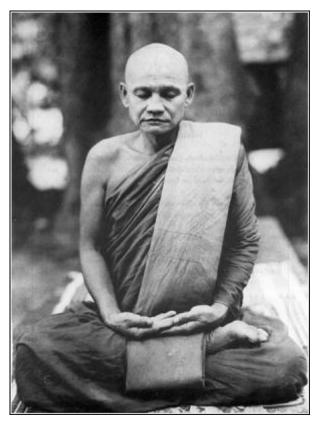
最近读到《南方人物周刊》对缙云山李一道长的采访报道,上面提到,李一道长的皈依弟子超过三万,其中一半是商界精英,政界、演艺界和学界中人也有许多依止。这篇报道出来后,引起众人热议,猜疑、批判者众多,这里并不想就事情本身作任何判断,但是,道家文化的这番"复兴",从精神需求上看,自然是由于今天社会的剧烈竞争引发的"意义"渴望。无论是寻找人生信仰,还是只想浅饮"心灵鸡汤",都似乎表明,生命意义问题逐渐凸显,除开道家复兴,其他宗教的信徒,无论地上地下,数量也在与日俱增。反观今天的学院知识人,虽然著述等身,但在基本的精神问题上却难以给公众提供可信、可靠的论述,影响力日渐衰微,毕竟知识人自身的精神危机,本就岌岌可危,何况"度人"?

不过道家文化的精神解决方案,在国人看来,大体还是以养生为本,余英时先生的《东汉生死观》(侯旭东 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里就提到东汉时期士人与百姓以"养生"与"延寿"去理解道家思想,结果让中国的道家气质并不是往"求仙"的彼岸世界去发展,反而是落实到此世肉身的利益上,想象张悟本的"绿豆神话",我们就可明白,"养生"作为一种方式,成为国人解决"生死"问题的间接方案。但无论如何,前述那些去缙云山缓解心灵焦虑的各色人等,对道家文化到底怎样理解,我们并无法知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生死"问题与生命意义问题,至少是他们共同面对的人生议题,尽管许多人并没有对此进行清楚的表达。

比起道教的养生,佛教对"心灵"的治疗则是另外的路径。近些年来,南传佛教的禅修方法开始进入内地,其中著名者,当属葛印卡以及缅甸帕奥禅林中少有修行有成的华裔尊者玛欣德在各地举办的禅修营,南传佛教的朴实与通俗特色使得许多年轻人迅速接近佛教,尽管这种接近,也带有这个时代所独具的各色各样目的,甚至有人称这股热潮是"小资禅"。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佛教教理所强调的对于"心"的对治,确实影响了不少的年轻人。这方面的书这些年也是数不胜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泰国著名禅师阿姜查的系列著作,如《无常》(赖隆彦译,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8年)、《这个世界的真相》(果儒译,南方出版



社,2010年4月)、《关于这颗心》(赖隆彦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等等,南传佛教的修行强调日常生活,反对经教言辞上的无益论辩,使得任何人都能迅速接受,并且马上可以进行禅修实践,据我所知,国内有一些僧人开始频繁地前往印度、缅甸各禅修道场学习南传佛教各个流派的禅修方法(如葛印卡、帕奥禅师、马哈希尔禅师及其学生),甚至有的僧人已经在国内各禅修营系统推行南传的禅修方法,影响力也在日渐增强,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影响汉地佛教,不少禅修者甚至直接飞往缅甸,进入到各禅林修行。这一趋势其实对于西方人而言,本不陌生,因为早从上个世纪初开始,许多西方人就开始陆续进入泰国、缅甸学习禅修,比如著名的杰克·康菲尔德,就是在阿姜查的巴蓬寺出家修行,后来回到美国还俗后,利用佛教修行技术来进行心理治疗,其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有《踏上心灵幽径》(易之新等译,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9年)、《狂喜之后》



(周和君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另外一本《当代南传佛教大师》一书则是在台湾由园明出版社推出,大陆尚未引进。关于禅修的特色,在这本书里,康费尔德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位著名佛教女学者来参访我的寮国师父。这位女士在曼谷定期教授阿毗达磨和复杂的佛教心理学。在跟我的师父交谈时,她不厌其烦地叙述佛教心理学有多么重要,以及她的学生因为跟从她学习而获得很大的帮助。接着她问我师父,是否同意了解佛教心理学是重要的一件事。'是的,很重要。'我师父回答道。她面露悦色,再问我师父是否也有学生在研究阿毗达磨。'哦!当然!''那你教他们从何处下手,那些书或论着是最好的?'她进一步追问。'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我师父指着自己的心回答她。"

西方人的这种禅修风潮甚至还回流到美国、英国等地,许多 人陆续开办了各种禅修道场,影响力也与日俱增,笔者认识的一 位研究宗教心理学的美国教授,近年来也对佛教禅修表现出极大 兴趣,这或许说明,西方学术界对于佛教修行的态度也要比国内 知识人开放许多。

不过对于许多人而言,禅修尽管能缓解心灵的焦虑,但是却难以接受佛教的一些根本宗旨,如六道轮回与业力说,恐都难为今日许多人所接受,尤其是经过"理性化"熏陶过的人,对这类宗旨往往斥之为邪说迷信,难以发心信仰。毕竟受儒家文化熏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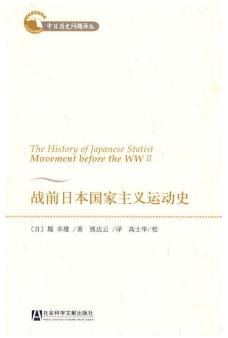
过的知识人群体,大抵都会接受"神灭论",而认为"六道轮回"之不可信。但可信不可信,恐怕还是要亲身体验才能做出判断,毕竟佛法讲究的是"信解行证",没有亲身实修,怎可妄言之?

儒家对生死有无什么独到的看法呢?对此大家熟悉的当然是孔子那句著名的"未知生,焉知死?"不过这一看法是否就能让人心安,就能了生死,那却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北大的陈来先生最近几年开始反思儒家思想,他从梁漱溟先生早年修习密宗的经历开始反思儒家传统的"工夫论",也就是宋明儒家常爱实践的"静虑",来表明今日儒家思想自身修行技术上的缺陷。而且陈来先生还提到两段轶闻,不可一世新儒家狂人熊十力先生在临终前口念《往生咒》,而另一位以"理性"文明的新儒家代表冯友兰先生则在去世前表现出对死亡的巨大恐惧感,都或许表明了儒家如无佛教的生死观作支撑,其内在精神极可能流于"贫血"的状态。当然,信奉儒家之人或许极易拿出反例,钱穆先生在1952年所写的《如何解脱人生之苦痛》(《人生十论》,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三联书店,2009年)一文中,就明确地不同意释老之说,他写道:"佛家之涅槃,耶教之天堂,老子之无为而自然,都属憧憬此境界。孔子则吃紧为人,把握此一段有限之生命,即在此有限中下工夫,只求此有限之完成,再不想如何跃过此有限而投入无限中。正因为人人都有此一机会,必然会跃出有限,跳进无限,那是天和上帝的事,鬼和神的事,非我们人的事。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未知生,焉知死。人生观其实由人死观而来,一切人生真理都由有了一死的大限而创出而完成。"从表面看,钱穆先生这段话未尝没有道理,可惜生死问题不是言词游戏,是否真的彻底了知了生,则恐怕不是简单地几句分析就能真正证实的了。

谈完"生死"问题,我们还是回到政治吧。笔者前年在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访问时,曾留意过美国大学政治学系的专业设置,一般而言,政治哲学在实证主义风气浓厚的美国学院体制里,只能算是边缘化角色,尽管波士顿学院拥有斯特劳斯学派的嫡传弟子(如 Christopher Bruell)和一些有名气的拥趸,但仍然难逃边缘化的命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斯特劳斯学派并没有延续与发展,如最近刚刚出版的《斯特劳斯、韦伯与科学的政治研究》(陆月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一书的作者贝纳加(Nasser Behnegar)就是中生代的各种翘楚,而且他也恰好就在波士顿学院执教,在我访问期间,他还在开关于尼采的课程,不过由于我当时的兴趣已经转移,未能一睹风采。

贝纳加的这本著作,其实是延续着斯特劳斯的下列问题意识:即韦伯所代表的中立性社会科学对于政治科学而言,意味着什么?如何让我们摆脱这种价值中立、事实一价值二元分立的认识论,从而恢复一种真理取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不过有趣的是,贝纳加由于其伊斯兰裔的背景,这些年也开始关注伊斯兰的宗教与政治之间关系问题,由此可见,斯特劳斯学派无论如何,也需要回应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最近有几本东洋学界的著作同样值得关注,一本是崛幸雄的《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熊达云译,高士华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此书系统地检讨了二战前日本国家主义思潮的发展演变,对于国内初冒苗头的"国家主义思潮",此书无疑具有解毒剂之功效。另外一本《"昭和的教祖"安冈正驾政治思想体系研究》(陈涛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3月)介绍的是曾影响日本政经界至深的安冈正笃,此公迷恋阳明学,以儒学为本,成立了"日本全国师友协会",规模达一万多人,日本政经两届参与人数众多,包括池田勇人、吉田茂、岸信介、福田纠夫、大平正芳及铃木善幸等等,连中曾根都经常受其耳提面命,足可见安冈地位之高。不过略让人遗憾的是,此书的体例与研究方法仍显老套,观点也有许多商榷之处。



义江彰夫的**《日本的佛教与神祇信仰》(陆晚霞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4月)**虽然讲的日本信仰问题,但我们只要思考一下靖国神社问题,就会知道,政治思想如果摒弃了宗教信仰问题,将会显得多么不可思议,而让人担心的是,当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似乎认为这种分离是如此的正当,而无需认真对待。

从生死问题谈到政治哲学,最后又绕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上,无不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精神世界重建,可谓是任重道远,任何的固步自封与一叶障目,最终反映的不仅仅是这个时代的无奈,它造成的最大伤害,或许还是我们这些因追求精神生活而为其所"误导"的人们吧。

图2为阿姜查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angxiaoyu1978@sina.com)

上期我在"独立阅读"里讲到郭永胜先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不知何处寻找,收到 Jie Lv、涛涛、Steven、Chen Shi 四位读者朋友的邮件,这些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们告知各种相关信息,老友宋宏兄也发来下载链接。诸位旧雨新知的盛情,让我感激涕零,这里跪谢了!

天气太热,没有去书店。准备买的书有很多,**爱伦堡的《解冻》(钱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曼德尔施塔姆随笔选》(黄灿然译,花城出版社,2010年6月)、以赛亚·伯林的《苏联的心灵》(潘永强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7月)、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常江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7月)**,只看作者和书名就让人见色起意。

还有些书,等了很久,见到却有些犹豫。周克希先生翻译的《**追寻逝去的时光》第** 二卷《在少女花影下》(普鲁斯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6 月),终于出版,与第一卷时隔 6 年。新出的第二卷和重印的第一卷,重新设计了封面,很诱惑。但是拥有老版第一卷的我,却不知道是把新版两卷都买回去,还是只买第二卷。想了想,就暂时没有买。

我经常买椟还珠,犯形式大于内容的形而上学错误。买了怀特的《这就是纽约》、《重游缅湖》(均为贾辉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1月),再看到《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孙仲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8月),就像集邮一样攒了回去,放在



书架上居然开本不一样,于是把这套书从书架外侧发配到内层。张千帆先生的《西方宪政体系(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上册、2004年2月,下册、2005年12月)同样如此,上下册开本迥异,仿佛一本抱着另外一本。



对于《追寻逝去的时光》,最为担忧的是周克希先生的七卷本何时出齐。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第一卷出版于 1987 年、2..8元,第八卷出版于 2006 年、45元,读者等了 20年时间终于完璧,译者杨岂深、杨自伍父子接力,前后翻译加校订耗时近 30年。汝龙先生翻译的《契诃夫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第一卷出版于 1980年、1.75元,第十六卷出版于 1999 年、26.8元。《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第一分册出版于 1983 年、2.45元,第十三分册出版于 1994 年、20.5元。等待《追寻逝去的时光》七卷本的时间,估计会创造新的记录,届时译者和读者可以写一本《追寻<追寻逝去的时光>的时光》。

最近买了两种书,但是稍嫌冷门,不推荐诸位购买,这里汇报一下阅读感受。一种是**《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倪瑞英等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2月)**,属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之一。有些奇怪的是,这套编译丛刊货源充足,随处可觅,但是这一

种却在书店和当当、卓越都已脱销,最后我在淘宝上购得,版权页注明已是两次印刷共计 **4000** 册。如此难以寻找,难道是八国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委托大使馆把这些书统统回购了?

1900年至1902年,八国联军在天津成立临时政府。书中的一些细节,读来有些意外。随意翻开一页,1900年10月22

日,这一天临时政府委员会的议程有 16 项,略举几例:俄国军医指出,由于华人向白河倾倒垃圾,水质遭到污染;一家清真寺被德国士兵侵占,临时政府致函德军司令,要求德军撤出清真寺,以与回民保持良好关系。这些议程之后附有索引,可以查阅它们在后续会议的处理结果:关于水质污染问题,10 月 24 日会议表示,此前医疗会议已有研究,但一筹莫展;关于德军侵占清真寺问题,11 月 1 日会议透露,德军参谋长来函,德军已经遵照要求从清真寺撤出。

购买《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蓄谋已久;购买《圣马力诺共和国简史》(朱塞佩·罗西著,袁朝云译,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纯属偶然。有事途经世博,顺便逛了几个场馆,我一直没有养成排队的文明习惯,于是省略热门的大国,直奔冷门的小国。远远地看到圣马力诺馆醒目的主题"城邦国家:世界上最小和最古老的共和国",杀将过去。进门就文化震惊了一下,这个面积只有60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万左右的"小国",在展馆门口赫然印着他们尊重的"普遍价值"。"普遍价值"即"普世价值",但不知什么原因,"普世价值"在中国几乎成了敏感词,"普遍价值"因为出入于"金口玉言"而通行无阻。圣马力诺馆精确地使用了"普遍价值"一词,对于中国国情了解之透彻,让人叹服。可惜的是,"普遍价值"的具体内容,原以为网上肯定可以找到,没有拍下照片。谁知回来在网上怎么也没有找到。将出展馆,在纪念品销售处看到《圣马力诺共和国简史》,虽然是闭架销售,还是立即拿下。看到目录,"自由权利的重新确认"、"对抗暴政的坚固堡垒"、"我们的共和时代"等等,知道没有买错。葛兆光先生在接受《书城》(2009年4月)采访时,回忆文革期间读书,"一类是那个时候的内部白皮儿书,像《圣马力诺史》、《匈牙利史》什么的",不知这个《圣马力诺史》是哪个版本。

一边参观,一边思考小国是怎样崛起的,在短短的十几分钟的参观过程中,我已经成为圣马力诺的粉丝。参观列支敦士登馆也有同感,都是一见钟情,两国展示的国家形象让我心悦臣服,当然,不是卑躬屈膝。国家形象的展示,归根到底是核心价值的展示。没有核心价值或者只有反人类的价值,不惜工本地用运动员和演员拍点宣传片,只会适得其反。刚刚看到《东方早报》(2010 年 8 月 6 日)编译西班牙《马卡报》的报道:全球最大的球场坐落于东亚某国的首都,于 1989 年 5 月 1 日落成,体育场呈降落伞状,由 16 个半圆形跨间形成屋顶,建筑面积达到 20.7 万平方米,观众容量则达到 15 万之多,是伯纳乌球场的两倍,比诺坎普球场多 5 万人,这座综合性体育场,不仅能主办足球比赛,还能举办其他各项竞技比赛。我关心的问题是,球场旁边是不是矿场?

图 1 为八国联军治下的天津市民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HONGKONG 香港

注了水的猪肉, 毕竟还是猪肉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 (北京, 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今年的英国大选尘埃甫落未定,香港作家陶杰便在大陆的《南风窗》杂志发表专栏,把英国新上台的保守党首相卡梅伦、自民党副首相克雷格以及谢幕的工党前首相布朗比喻为 1949 年前后的毛泽东、张澜和蒋介石。在陶杰的文章里,毛泽东与卡梅伦二人都是以新代旧、声名日隆,张澜和克雷格均是审时度势、伺机站队,至于布朗与蒋介石,都曾有过位极人臣的辉煌却终不免将大好的党国江山送人,所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二位恐怕也只能晚年在安乐椅上回味一下"振兴工党"或者"反攻大陆"的春秋大梦了。

这软中带刺的幽默却在文章的临末异峰突起,陶杰写道:"布朗'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到底是绅士,他不是流氓,权力交替之间并无血腥暴力。难怪英国到今天,国力再萎缩,其政治道德仍垂范于世。"言下之意是说,有些搞政治的人偏偏就不是绅士、有些甚至是流氓、有些政权的交替充满血腥和暴力。话中既损了蒋介石,又顺带攻击了伟大的党一把。虽然言辞间的巧妙伪装可谓羚羊挂角,但陶杰下等蕴藏的力道,在某些人眼里,仍堪称"其心可诛"。

或许,这足以解释为何写书无算的陶杰至今在大陆只出版过作品集结薄薄一册。众所周知,陶杰可谓连打个喷嚏也满地掉字的"藻鉴之人"(man of letters),写作往往信笔由僵、笑骂成文,若身在大陆,日久必定"闯祸"。实际上,被人调侃为

"一日不抽水(打嘴仗),一日不吃饭"的陶杰多年来一直"闯祸"不断,远的不说,2009 年陶杰在一篇英语文章中戏称菲律宾为"仆人的国家",便激起菲律宾人不满,陶杰的名字亦被菲律宾政府列入拒绝入境的黑名单。设若此文发表在大陆官方的 China Daily,当真是要闹出国际玩笑了。



但要说陶杰文章的"祸",其实最多还是"闯"在了香港。这个只求三分钟热度、不求深度的城市,对于陶杰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实在倾注了太多感情,有太多"抽水"的空间。他的文章结集《这个荒谬的快乐年代》,便是这份感情的凝结,其话语间的讥刺,当作恨铁不成钢之解。

"特首这份工难打",陶杰劈头就是一句。何故难打?只因要双向负责:既对北京的中央负责,又对香港中环的小圈子负责,夹在中间,难以做人。97 大限之时所谓的港人治港在陶杰眼中早就变成了"中环精英治港"。然而,这些中环精英们,得了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好处,多少年来习惯了养尊处优,"宴会饭局,不是镛记贵宾餐厅碰头,就是马会厢房遇上,越是身娇肉贵,脸皮越是嫩薄",眼里生怕盯丢了的,"不是中南海大员的秘书,就是省委书记的侄女",总希望"背靠祖国"蹭点好处,自身的胆量和气格还未上战场就先泻掉大半。于是,想学西式民主却又只得其形而不得其神,空给人留下一个"很孬"的印象。

"孬"的公务员队伍,必然有一套"孬"的政治文化与之配套。回归十三年来, "普选"呼声不绝于耳,英式宪政被人们奉为无可超越的最佳体制。但是,历年来投票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一百七十多万,不及已登记选民的一半,对于香港受英国政

治文明影响百年、公民意识强烈的地区来说,这样的政治冷漠"其可怪也欤"!

说怪其实也不怪。港英政府百年殖民统治,一朝"回归",心态和自我定位难以调试得当,即使过了十多年,最高行政长官说话仍带有殖民地时期港督的味道:"我和香港市民亦深深感受到中央对香港的信任",言语间战战兢兢、恨不得"感谢国家",却又似卸任港督正在受英国女王册封。但毕竟是"港人治港"的时代,在陶杰眼中,如今的中环精英们换了身皮,继续领着殖民地时期的高薪,却尽着中国传统"父母官"的责任:"永远把统治的草民当小孩",永远不"给民众断奶",同时永远失职,但永不失业。

这便造就了香港这个"快乐"的荒谬社会,因为快乐的代价是愚蠢。神话里,西西弗受诸神惩罚,不断地把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因它自身的重量又会滚落下去,他不得不回到山下,把石头重新推上山顶,如此反复。加缪据此断言:西西弗是快乐的,否则他不会欣然重复着这绝望的工作。陶杰则说,香港人大体而言是快乐的,因为"精英治港"的愚昧也在不断重复着西西弗一样的工作:教会大家不要思考,至少不要用大脑思考,教会大家不要投票,至少不适用自己的双手投票,这个道理得月月讲、天天讲。

以小喻大,香港的问题莫不是中国的问题。若论时事的荒谬,如今大陆较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认识到荒谬的前提是 承认存在一个理性的原则和共识,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并遵循,有如此的对立面,这"荒谬"的概念才算成立。不错,随着"鸡 的屁"数字上升,现在我们的快乐较之"早请示,晚请示"的年代多少增加了一点,然而人们心中的荒谬感却并没有比那个 年代减少多少,又或者,党疼国爱的我们是否又意识得到这种荒谬呢?就算意识到了,是不是也仅限于"不敢言而敢怒",甚 或在"独夫之心日益骄固"的前提之下,连"敢怒"的胆量也给驯化了呢?

这大概是陶杰对左派缺乏好感的原因。

但追根溯源,陶杰自身亦是出身左派报业世家,其父曹骥云曾将他送入香港左派学校念书,以期其根正苗红,但谁想这位《大公报》掌门人的公子最后不但不"红",反而选择了"崇洋",跑到英国念起了英国文学和国际关系,并且这一"崇"就是十余年,等到再返回香港时,他已经是为老牌资本主义广播台——BBC 服务多年的资深记者了。从左派报业世家到右翼媒体人,陶杰的经历仿佛验证了奥威尔的那个著名判断:左派右派本是一家人。

是左是右并不打紧,打紧的是,注了水的猪肉,毕竟还是猪肉,掺了假货的民主,总好过压根拒绝民主。以陶杰之学养,够否资格称"香江第一才子",尚属见仁见智,但这样一位"极崇洋能事"之人能否堂而皇之地做他的"才子"、在报章上拿"特首"开心而相安无事,则见一个社会的包容度与文明度。

陶杰:《这个荒谬的快乐年代》,香港: 皇冠出版社,2010年2月,HK\$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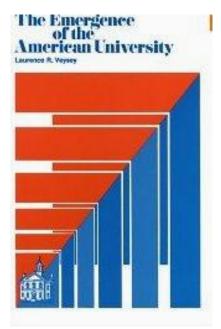
BOOKREVIEW 书评

非常时期的大学行政化(之一)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 (上海, sunchuanzhao@yahoo.com.cn)

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 他们多么令人敬畏。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 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



凡尔赛(Laurence R. Versey)的《美国大学的非常时期》(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University, 1965)今年年初已经翻译好了,估计北京大学出版社不久就要出版该书。得以译者的信任,我有幸作为第一个读者拜读了她翻译的书稿。凡尔赛所谓的"非常时期"是指 1870、1880 年代至 1920 年代之间那半个世纪。该书叙述的是那半个世纪中美国大学的变迁。凡尔赛以东海岸常春藤大学和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作为变迁史中时代的典型,通过对美国大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那时期几所最著名的大学掌门人办学理念的细致、微观解剖,宏观描述这些美国一流大学的半个世纪发展:如何从继承欧洲大学传统出发,在美国特色的实用主义哲学驱动下,在若隐若现的功利主义和反知主义倾向之中发展。该书从一手史料着手,做工精细,问世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不失其在美国大学研究史上名著的地位。

该书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第七章《不协调的问题》。因为这一章叙述的历史正好是离今天 100 年前的事情,也就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最初 10 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当时美国大学存在的尖锐的冲突和矛盾——"不协调的问题",表面上也与今天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有些相似之处。即当时美国大学教授从德国同行那里学来追求"学术自由",渴望拥有更多学术自由,而大学行政一方却追求更加合理、有效的经营管理,需要对教员的教学和研究有更多限制,于是劳资双方"不协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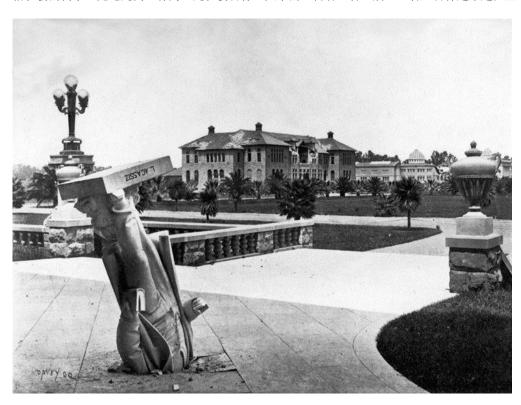
那年代是美国的大学行政化与教员的学术自由的追求之间矛盾尖锐化的时期。几年前起,"大学行政化"这个词为中国学者独创性地开发出来了,成为中国网络上、媒体上"有文化的人"使用频率最高的用词之一。当教育部的首脑公开表示政府从来未曾赞成和提倡过教育产业化、大学产业化之后,网络上、纸媒上学术圈内外对教育产业化、大学产业化热火朝天的谴责、声讨很快几乎销声匿迹。人们似乎发现产业化不是中国教育、大学腐败难以遏制癌症的病原体,找到了新的真正的病原体一一行政化,取而代之的是持续不断地强烈谴责大学行政化。——这只是新的一场中国文化人、大学人导演的滑稽剧。

三、四年前,我翻译了希尔斯编辑的《韦伯论大学》那本小册子之后,在介绍韦伯的大学论和托尔斯坦·凡勃伦《美国高等教育》的几篇文章(都收入《大学之外的人文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中,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何美国这样一个教育、大学产业化、商品化、公司化最早、最彻底、最成熟的国家里,学术腐败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赶不上中国,而名牌大学的数量、科学技术水平在全世界独占鳌头?中国教育、大学、学术腐败根本的病原体是否是"产业化"?中国的产业化与美国的产业化本质上有何不同?我的本意是抛砖引玉,希望有研究条件学者关注这个课题(这个题目很大,鄙人无研究物质条件),但是在一个学术界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国度里,不会有学术人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学术大腕们倒是看准、把握了市场的商机,趁腐败现状之机,不断提倡、实践起昂贵的"人文教育"、"博雅教育",满足那些佯装斯文的富

二代购买人文包装的祈望,名利双收。

为了介绍凡尔赛这本书的第七章《不协调的问题》叙述的美国百年前的大学经营者追求行政化与教授们争取学术自由的冲突是怎么回事?我在这里不得不借花献佛——稍微借用一点栾鸾老师的译文(引号内和灰色字体的引文都是栾鸾翻译的凡尔赛书中第六章或第七章里的原话)简单介绍凡尔赛笔下的当年美国大学行政化,顺便谈点自己的感想。

到了 19、20 世纪交替年代,美国大学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即随着现代化,大学越来越摆脱神学的束缚,屈从于世俗社会的需求,无论是商业行为还是社会目标,大学的经营者、管理层——管理目标越来越注重"公众品味"。



作者凡尔赛比我们批 判产业化、行政化的公共知 识分子要宽容,因为在北美 与其他国家一样,教育机构 里的人与其他行业相比,毕 竟还有点文化,要装点欧洲 传统学问秀气的门面,只是 不得不走出象牙塔,"屈 从"、迎合"公众品味",很 晚才让"铜臭"飘到桌面上 来,所以"事实上,从最广 泛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屈 从于这种趋势的过程已经 很缓慢了,因为如果回顾过 去,人们就能发现,早在 17、18 世纪海港的商人贵 族中就已经出现了对管理

威严的重视。从这一更长久的观点看,世俗的志向只是又赢得了一座重要的堡垒。"而大学管理者追求效率的行政化与教授们"学术自由"的最初、表层的冲突表现在劳资对立、纠纷上。美国历史最久的一流大学几乎都是私立大学,创办人是老板,办学方针、教学和研究大大小小规矩都是个体老板说了算。如克拉克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创办人就是个体老板:

据说乔纳斯·G·克拉克认为,他的教职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雇员,他们应该接受以设备形式给予他们的东西,就像企业家可以雇佣和解雇职员一样,他们也可以被雇用和解雇"。甚至和善的伊兹拉·康奈尔在活着的时候也喜欢在"他的"校园漫步,摆出业主的架势。

大学规模大了后,家大业大,个体老板管不过来,老板身边不仅有个董事会。具体的管理还需要个高级打工者校长来主管(按照 1950 年我国政务院颁布的划分成分规定,是资方代理人、资产阶级成分)。企业越大,管理越复杂、越显得重要,于是,虽然那时期大学与一般企业不同:

在管理它的(大学的)商业事务时还是应该……使用明智而必要的商业手段。因为(大学)是企业,同样也是道德和学术的工具,如果在管理中不使用商业手段,它就会垮掉。……19世纪 90 年代之间及其后,更年轻的主管们在很多美国重要的大学当权。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用管理技巧取代忠于任何一种标准学术目标的新主张。

百年前,美国的大学人虽然没有达到今天中国"有文化的人"那种愤怒程度批判产业化,但也很严厉:

约翰·杰伊·查普曼有点夸张地抱怨说:"代表教育和学问的人具有企业家的理念。他们实际上就是企业家。今天掌管哈佛的人也和商人差不多,他们经营着一家向上百万人兜售教育的商店。他们的工作就是使其成为美国同类机构中最大的。"约翰·杜威在 1902 年更清醒地断言:"(学术)机构是根据其显而易见的物质财富来排名的,直到赚钱和花钱的氛围掩盖了只有金钱才能获得的利益。"查普曼说,这样的控诉以极端的形式指责大学领导人或多或少直接地听命于工业巨头。"就像老板是企业家的政治工具一样,学院的校长就是他们在教育界的代理人。"

凡尔赛认为 1910 年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当时大学人的著述中,最全面归结了产业化给大学带来广泛的危害,它涉及:"商业控制几乎参与了现代大学的各个方面:花钱建造高楼的趋势;官僚机构的扩大;兄弟会和体育运动的知名度;研究生院对本科学院的从属地位;职业课程;所有的名誉之争,等等。"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有中文版,大家可以找来原著读一读,看看美国的产业化与我国产业化有何不同?我在这里再度提醒中国读者,美国最早起步的、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水平最高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那时联邦政府没有管理全国教育机构的教育总署,美国大学产业化也是在美国自由主义社会制度下、自由经济商业体系中的产业化。因为这种大学产业化是自由经济市场的结果,最多"大学领导人或多或少直接地听命于工业巨头",内中没有直接来自政府及其行政机关的诱导、计划、控制等要素,所以,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凡尔赛在该书的第六章中,也注意到凡勃伦当年不认为大学这种趋势无可救药而完全绝望:"他不认为这些趋势是有计划的结果;他认识到其中有放任自流的因素,而他并没有指责理事们和校长们故意犯错,而是指责他们虚荣、热衷权力。"换言之,是这种产业化的竞争诱发大学内部行政管理强化、追求合理化的趋势。美国这种大学内部行政化与19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帝国以后德国国家在各方面强化大学行政管理的行政化有所不同,后者的行政化驱动力的源头来自大学外部——国家权力。

而且,那时期美国大学的管理者大多数"拥有比一般教员职员有更好品质和眼光",不少人对管理合理化、效率化和学术自由冲突和矛盾表示无奈。比如,"威廉·詹姆斯是在私下,比较礼貌地表达了这种忧虑:'我觉得,在我们以高度的认真态度和责任心组建(学术)机构时,我们有可能会破坏那些对学问而非对管理感兴趣的人的生活'。"又如,约瑟夫·贾斯特罗虽然语气刺耳、不客气地表示如果不能忍耐这样管理下规则的人,做点牺牲的人"将会微妙却不可避免地丧失学术交流的精神、对个人品格发生影响的、优势职业印象——品质中较好的部分。"但话中也暗示了他理解教授们内心的追求和自己的无奈。

那非常时期美国的大学教授们纷纷对量化统计管理;大学管理层根据市场决定学科专业、科研的课题;外行领导内行等等具体问题抱怨,抗议自己的学术自由受到侵犯,而这些抱怨、抗议都是一些细微末节的问题,而非本质,凡尔赛在书中援引沃尔特•P•梅茨格的话来点明行政化的要害:

19、20世纪交替之前,美国的学术自由主要关系到与学院之间的雇佣关系,而非教育理论、学术倾向等问题。即使在学术研究可以自由支配环境中,也摆脱不了与安全、地位、薪水等问题的联系。

董事会、管理层追求资金来源、收支的盈利最后限制学术自由的终端杀手锏——威胁到大学教师所谓安全、地位、薪水,对于教师来说,说白了就是一个保住饭碗问题、争取更好的饭碗问题。教学、研究上违背董事会、管理层的意向、方针就有被解雇之虞。市场决定财源,私立大学金钱决定发言权,金权——投资者控制董事会,董事会通过代理人校长实施管理,即通过物质、人事资源管理制度调节、控制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教授对任期合同的需求大半是为了获得安全感。就该书援引大学教授亨利•塞德尔•坎比回忆:

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感到安全,拿着一份能维持生计的薪水待在现在所处的地方,在工作时感到安心,……节俭和外快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保障。我们依赖学院,而它本身的资金也很紧张,既不能指望它明智,也不能指望它公正。1906年,卡内基基金会意识到了这种教职员担心的现实,当时它实施了一项全国性计划,在教授从现任职务退休时给他们提供养老金。虽然卡内基计划最初的形式仅维持了几年,它对保障教授安全的推动也许是学术自由在1910年之前最重要的收获。

美国大学教授们都认识到束缚自己脑袋和手脚最大的威胁是丢饭碗,盎格鲁萨克逊教授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有多么硬气和刚强,都要留这样大学体制内——保住饭碗,也只有和中国的同行一样软弱地妥协。最具有代表性的斯坦福大学解雇罗斯的事件,因为老板斯坦福老太太个人认为罗斯过多参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虽然当时大多数斯坦福大学教员对罗斯丢了饭碗表示同情,但是,"事实是,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教授们总有要吃饭的孩子),斯坦福的绝大多数教职员都认可了管理层的立场。"当某人被解雇的时候,"人们不会承认他的免职是出于反对学术自由,而是因为他无能。"

20世纪初,经历了劳资双方冲突、教授与董事会冲突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经历了"罗斯事件"之后,争取学术自由斗争得来的最大成果,只不过是美国大学开始建立对学有所长的教师考核后实施终身雇用教授制度。

凡尔赛这么评价百年前的美国大学人的觉悟的:

1900 年之后的十年中,实际上每个美国大学校长在提到学术自由时都会在评论中引入一些这样的限制性暗示。因而这些主管仍然属于 19 世纪美国政治传统的主流,这实际上是在道德法律的框架中宣布支持自由。 ……

只有少部分美国教授希望在大学中得到"纯粹"的学术自由。……即使在政治和经济的分歧上(这种分歧比较简单,因为它们没有质疑知识的本质属性),要求学术自由的呼声也不能完全赢得学院的支持。这种概念拥有的影响力仍然太不确定。在 1910 年的美国,它很难成为一种"破坏力",……结果,向学院效忠的态度大为盛行,有利于"冻结"学术界的争论,但是还保留了恰到好处的另一种不忠的传统,。对学院的忠诚——在美国通常意味着建立在感情上的"支持主义"激情——能够在危机中使斯坦福这样的大学免于崩溃,但是它是派系中大多数人的反应,而始终不是一种能获得一致认可的准则。

总之,美国大学人迫使雇主一起建立了一个能使饭碗相对稳定的雇佣规则。因此看到 1929 年大萧条社会的惨状,罗斯福在 1940 年代提出在必须的人权中要增加一条免于匮乏的恐惧,即使对于金元帝国富裕的美国知识界、大学人来说,也会对丢饭碗感到恐惧。这里我在前面提出的、与批判产业化祸害引发的问题一样,我在这里要问,美国大学的行政化是更明显的钱权交织在一起的一元化领导、美国教授也从来没有从董事会那里获得治校管理的大权,先不说其他问题,那个涉及饭碗大问题的终身教授制度在实施时候,为何百年来也没有层出不穷的因申请者的金钱或女色行贿、评委乱用权力、提交做假的成果等各种舞弊呢?为何今天美国大多数大学行政化管理很有成效,没有出现我们大学目前那种腐败的乱像?行政化对于大学管理来说真是祸首?(待续)

凡尔赛:《美国大学的非常时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待出。图 2 为 1906 年美国地震后的斯坦福大学校园

BOOKREVIEW 书评

建国大业美国版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angxiaoyu1978@sina.com)

一提到美国的建国大业,我们总是想起莱克星顿清脆的枪声。但是美国之特色,不在于"枪杆子里出政权",而是"笔杆子里出政权"(或者说"嘴皮子里出政权")。1775年,莱克星顿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1776年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通过《独立宣言》,成为开国十三州;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八年抗战"宣告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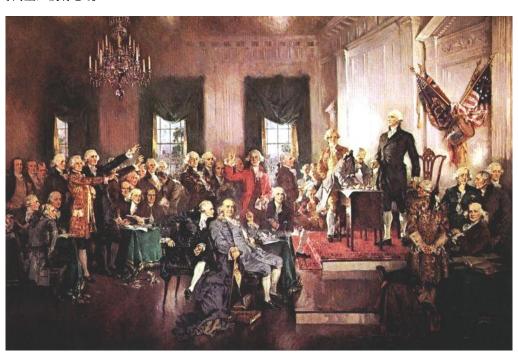
战争结束,海晏河清的景象却没有立即出现。《独立宣言》宣告十三州独立于英国之外,但十三州各自为政,还是紧密团结在中央政权周围,成为新的问题。《邦联条例》决定设立邦联国会,可是邦联国会的权力遭到重重限制,没有军队,不能征

税,十三州保持相对独立。

独立自主的美国,一度比在大不列颠统治之下还要混乱。1787年,在通过《独立宣言》的旧址召开了制宪会议,最初准备修订《邦联条例》,后来发现仅仅修订《邦联条例》已经是杯水车薪,开始起草宪法,一边扩大中央政府的权力,一边以三权分立避免过度的中央集权,构建一个联邦制、总统制的共和国。1789年,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也就是说,美国宣告独立之后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没有总统。

没有1787年的制宪会议,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的大国崛起。如今看来,制宪会议是胜利的大会,奠定了美利坚合众国长治久安的基石,但当时看去,制宪会议绝不是团结的大会,围绕建国大业中的种种棘手问题,代表们从五月争论到九月。在《如彗星划过夜空》和《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里,林达和易中天向中国读者普及了制宪会议的过程。

如果说制宪会议是"嘴 皮子里出政权",制宪会议 之后报纸上对联邦制的激



烈争论,可以称作"笔杆子里出政权"。制宪会议发起人之一麦迪逊在百忙之中记下会议过程,结集为《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在报纸上力挺联邦制的文章,结集为《联邦论》(又名《联邦党人文集》)——尹宣先生先后翻译了这两本书,前者 2003 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先后被林达和易中天在写作时参考,后者刚刚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借用我们熟悉的框架,《联邦论》主要讨论美国应该统一还是分裂,但是统一/分裂的框架不足以描述双方的分歧。如果认为联邦论者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反联邦论者坚持分裂、反对统一,就把双方的观点极端化、简单化了。联邦论者主张建立一个拥有一定权力的联邦政府,反联邦论者更为强调各州的独立性,但是前者并不否认地方自治的重要性,后者也不否认需要存一个中央政府。

一个专制国家,经常放大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为自己的暴力统治寻求合法性,这种宣传特别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同,"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反联邦论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对于一个无所不能的中央政府保持高度警惕,政府会以行善为由谋求最大权力,一旦获得不加限制的权力,作恶的可能性远远超出行善。反联邦论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不反对政府的存在,只是对无所不能的政府表示恐惧。在一个稳定得几乎停滞的国家,公民可能像动物一样,只有生存权,没有其他公民权,暴力维护的太平盛世,不见得比乱世更值得向往。所以,联邦论者不仅要正面论述建立联邦政府的必要性,还要向对方辩友说明联邦政府如何与中央集权划清界限。双方拥有一定的共识,既要避免一个独裁君主式的中央政府,又要避免一盘散沙式的无政府状态。

联邦论者和反联邦论者不是在"太平犬"和"乱世人"里二选一,不是以"乱世人"的命运恐吓公众安于"太平犬"的生活。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存在巨大分歧,但讨论的焦点是,如何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可以保障国家富强,更重要的是,它保障公民权利不被国家以公共利益为名随意侵犯。

英美政治体制常被并称为"英美模式",可是从《联邦论》来看,美国的建国大业不是一边山寨、一边排外,而是坚持本国国情和学习他国模式并存。虽然英美刚刚交战,但以此为由彻底否定英国宪政的观点,几乎看不到。历史也足以说明,如果因此否定宪政,那不是跟敌国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论》,尹宜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5月,58元图1为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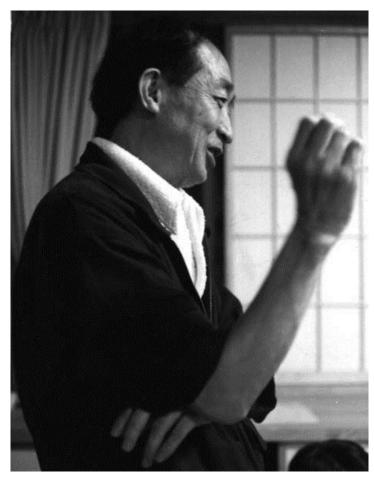
OBITUARY 逝者

沟口雄三: 汉学"手艺人"、越界者

特约撰稿人 刘柠 (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在 2010 年的"猛暑"中,日本知识界接连折损了两名重要成员:7月3日,著名文明学者、文化人类学家,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创始人兼馆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梅棹忠夫(Tadao Umesao)在大阪的家中悄然辞世,享年90岁;7月13日,日本著名汉学家、思想史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Yuzo Mizoguchi)因帕金森氏综合症于东京去世,享年77岁。前者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文理双修,在日本被称为"知的巨人",但在中国的影响却似乎有限;后者作为战后日本"知识左翼"的一员、汉学研究重镇,其知与行均对中国学界产生过越界的影响。

沟口雄三 1932 年出生于名古屋, 幼少年时代经历过战争,自觉对那场战争有"原罪"。儿时曾见过一张发黄的照片:一个中国农民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于背后,眼睛被布蒙住;日本兵双手挥舞军刀,做斩首状;其他几名士兵在一旁围观。看过之后,便忘了,记忆被长久遮蔽。大约 20 年后,在东京大学中国研究会研习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资本主义讲座》系列,头一次接触到日军在中国和亚洲诸国的残虐暴行及各地抗日的实态,不知为什么,儿时的记忆突然复活,此后终身难忘。以至于他认为"记忆,与意识形态构成一个回路,才得以确立"。昔吉田松阴被勤



王一方的僧人默霖劝诱"脱藩",吉田思前想后无论如何无法从之,回信曰"吾身有罪",权作答复。沟口对"吾身有罪"的表达有深深的共鸣。当然这未必意味着他认为自己身上有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或持日本应对中国谢罪的学术立场。作为学者,他历来反对学术研究与政治动机的"短路",但这个记忆无疑成了他自身存在的"原点",也是他后来研究中国问题时对"主体"问题念兹在兹的原因。

中学、高中时代,沟口是西洋文化狂热的追随者,全身心地拥抱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的小说和电影,用他自己的话说,"所有的细胞都散发出西欧文化的气味"。而中国的古典、小说,是断难入法眼的。抱着毕业后当外交官的理想,沟口进了东大法学部。确定第二外语选修科目时,开始被"顺理成章"地分到德文班,后受热心的中文教师的劝诱,决定到中文班"尝鲜"。待去学部办公室办转班手续时,被告知:"预定进法学部的人,学中文会导致人生的失败,大概是出于一时幼稚才有的想法。先把名字予以保留,如过半年决心仍未变的话,可转修中文。"被如此警告,年轻气盛的沟口二话不说便进了中文班。

虽说已然是战后,但教育的传统却来自战前。战前日本的外国语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是从英、法、德语三种之中任选其一,而中文则只是商业学校的科目。就是说,英、法、德语是基于对外国文化摄取层面的选项,而中文、西班牙文,则是商业道具而已。换句话说,现代中国文化根本未被当成是"外国文化"。当然,此所谓"中文"专指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自江户时代以来便以日文的汉文训读法研读,是正经的学问相比,现代汉语的学术性从未被日本知识社会所承认。战后,作为前

交战敌国的中国又走上了与日本在意识形态上相背的道路,更加剧了传统的鸿沟。因此,沟口的选择,不无与明治以来日本 近代教育传统的扭曲抗争的意味。战前,已经有竹内好等人开创了先河,沟口算是战后第一代汉学家。

东大时代的沟口,开始关注新中国的"人民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赵树理及其小说。从"细胞都散发出西欧文化的气味"的小资文青,到致力于普罗乡土文学"山药蛋派"的研究,这个转身不可谓不急,其主要动力当源自那个时代左翼知识人敏锐的问题意识。相反,对另一位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即留学北大、被视为日本现代汉学宗师的仓石武四郎的北京回顾谈之类的授业,沟口则颇有微词,认为其问题意识缺失,"不知所云"。

东大时代,沟口一方面帮忙家业,一方面继续做着外交官梦,同时还有另外一种人生设计。战败后的日本,会成为像丹麦那样的去武装化的农牧小国。这样的话,亚洲外交和农牧立国将成为必须。沟口梦想有一天能经营自己的牧场。为此,甚至尝试饲养过 60 只英国种鸡。外交官和牧场主,在常人眼里两种南辕北辙的选项,在沟口看来,却有着内在的逻辑。不过,由于家业方面的影响,沟口没时间准备外交官资格考试,与外交官和牧场主两个理想都"撒哟娜拉"。结果,毕业后十年,一直专心于家业,做起了贸易。但事务层面的历练,却让这个未来的汉学家提前"预习"了关于中国社会的功课,也使他看到了意识形态表象背后的东西。

纯商业的世界无法满足沟口的精神追求,他在工作之余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担任日中友好协会名古屋市的事务局长1。五六十年代,中日尚未复交,两国关系是纯粹的民间通商关系。为"中国展"能够在名古屋顺利举行,沟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突然有一天,中国代表团莅临,沟口被招到代表团下榻的酒店训话,当即被质问道:"遵从不遵从毛泽东思想?对武装斗争赞成还是反对?"当沟口表示拒绝"站队"后,竟遭从中国展筹委会名单上除名的"处分"。"中国的干涉那可真是蛮横无理没商量。"从自身的遭遇出发,对中国的文革,沟口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后来回忆说:

"若论当时我的身份,从中方看来,是日中友好协会在名古屋的大干部,文革前就曾应邀访华,做过友好商社",实际也搞过对华贸易。这个时期名古屋的文革追随者中净是以中国为对象热心做生意的中小企业主。看到那种情况,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说是看一群为生活而出卖灵魂的人无表情的苦恼也好,看人强作欢颜也好。因此,我既不亲文革,也不反文革,而持某种与中国保持距离的立场。"

这段从事"中日友好"的实务工作的经历,不仅未能加深沟口对中国的兴趣,反而令他索然,"极端地说,对现实中国正发生着什么已不再关心。"与此同时,他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3,重新埋头学术。此时的沟口年逾"而立",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早年的同学,有的已成副教授。尽管有一些社会经验,特别是对中国的了解,但以学术的标准来说,沟口无异于半道出家。好在他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一入侯门深似海,至此,沟口对事功层面的"出世"已然断念,惟学术是求。真也奇了,作为十年企业生涯的"代价",沟口此前患有胃病,而专注学术仅一个月后,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作为当代日本中国学重镇,沟口精通中国历史、哲学,熟读古籍(立志把《二十四史》读三遍,截至 2007 年 4 月实际读了一遍半),尤其对从宋代至现代的思想脉络有精深的把握。由他生前动议并亲自挂帅,由 21 名汉学家组成的学术班子锐意推进的、旨在将我国南宋思想家朱熹的《朱子语类》翻译成现代日语的 140 卷浩大工程于 2007 年启动,被看成是日本中国学基础研究之集大成工程。

沟口对自身的定位只是一名从事"研究职"的"职人"(日文,手艺人),而不是理论家。所以,对自己的工作,他无法理论化,只能作为"职人",确认自己所发现的是"真货"。"运庆在雕刻佛像时,说佛像是从里面出来的。我的情况,也有一种(研究成果)是从对面出来的,而非经人手雕琢的自负。"但惟其是"职人",沟口得以在学术天地里纵横穿梭,出门入巷,从容不迫把研究触角伸向了众多的领域,从朱熹到李卓吾,从黄宗羲到张之洞,从东林党到太平天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天理论、理气论到朱子学、阳明学,越界之深广在日本汉学界鲜有出其右者,真正做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而为其如此"越位"的研究提供学术"导航"者,不是别的,恰恰是研究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使然。

作为战后一代"知识左翼"的一员,沟口从系统反思日本近代化的学术立场出发,尖锐地批判欧洲中心论,主张重建中国问题的主体性。他认为,在前近代的中国思想中,一种不同于欧洲的"中国的近代"已然存在,并已准备就绪。对战后日

¹ 即事务性工作的窗口,大致相当于秘书长。

²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间外交、半官半民时代,对华贸易在中方的认可、授权下,基本上由一些日本民间的对华友好的小商社垄断,称"友好商社"。这些商社的创始人、老板中,有很多是前八路军的俘虏,或在延安当过"日本八路军"者,对红色新中国有极强的心理认同。

³ 即大学的研究生院。

本学界盛行的基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思维基础上的主流学术框架提出了挑战。例如,他认为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看成 是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是一种以讹传讹、缪种流传至今的"错觉":

"……我从中国历史文献中所发现的社会主义与之不同,毋宁说在宗族的相互扶助的传统之上,有所谓社会主义。 而这种东西若用话语来表述的话,是共助主义,毛泽东无非是把那种宗族意义上的共助机能扩大至国家规模而已。或者 说,应该由因主张不存在阶级制而与毛泽东终生对立的梁漱溟来谈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原本所谓的东西方意识形态 对抗并不存在。问题的主轴究竟何在,答案应该从对何为当前中国研究的应有课题这种主体的追问中产生。"

作为对主体性问题的系统追问,沟口于 1989 年出版的《作为方法的中国》4一向被视为代表作,对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沟口发现,大凡关心欧洲的中世纪和古代的日本人,其本人意识到与否另当别论,在其关心的深层,多少都横亘着一个欧洲的近现代像。换言之,日人对欧洲中世纪和古代的关注,往往以这种对近现代欧洲的想象为触媒,或为后者所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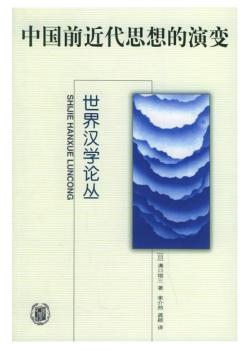
而与这种情形相对的是,日人读中国的古典,无论《史记》、《唐诗》或《碧严录》,基本上是一种"就事论事"式的文本阅读,阅读行为的背后,绝少有对中国近现代或古代的知识与关怀。或者说,他们对上述文本的阅读,仅仅是囿于日本的文学意识或禅宗世界的行为,并非通过阅读来了解中国唐宋时期的社会大变动。

这是一种遗憾,同时也是一个事实,与明治以来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所谓"文明价值论"有关:近现代中国在"文明价值"上不仅无法与欧洲相提并论,甚至连日本也不如。于是便有上文所述的反映在近现代外国语教育政策上对中国的"差别"。 沟口注意到,这种畸形的"去中国化"的"阅读中国"现象,实际上与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摄取动机系根植于日本内

部事情的"主体性"有关,本质上折射着近代以来"日本化"的甚嚣尘上。譬如,战前日本出版的以日文解释中文的词典,清一色称"汉和辞典",而不是今天通称的"中日辞典"。

因此,沟口主张,真正自由的中国学,其目的既不应仅置于中国及其自身的内部,反过来也不应被中国及其自身所消解;中国学应该是超越中国的中国学,即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毋庸赘言,"作为方法的方法",一反此前作为目的论的"方法",先于为什么而知的问题,优先于知本身。而以中国为"方法",客观上则意味着以世界为目的。如此,可期从根本上矫正过去那种"去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学",从而为重建中国学的主体性开辟了道路。

作为战后"知识左翼"阵营的一员猛将,沟口追求知行的统一,其思想具有强烈的行动色彩(尽管其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沟口作为首倡者及重要成员,与中国学者孙歌、台湾学者陈光兴等人共同推动的旨在通过对话厘清两国在战争认识和历史观上的问题点,以期正本清源、求同存异的所谓"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学术讨论项目,产生了超越国境的"辐射"效应。正如在日本国内,该学术项目被称为"知的共同运动"一样,尽管实际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人数有限,但由于彼时中日两国各自的国内情势、中日关系的紧张状况,尤其是两国知识分子指向性异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再加上日本



政府国际交流基金会连续6年的学术资助,使该项目的影响大大溢出了学术的边界,事实上演变为一场知识运动。

回过头来看,这场知识运动在展开的过程中,也呈露了中日两国因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而形成的对某些重要命题的认识落差。沟口生前曾谈及其在北京召开的该学术项目第一次会议上所遭遇的尴尬:当时的主题是"知识人的使命感"。对这一颇宏大叙事的命题,包括沟口本人在内的日方成员有相当的抵触,甚至反感。"知识人"是一个在日本战后历次社运和知识风潮中早已"死语化"的名词,被称为"知识人"有种造作感,令人脸热心跳,遑论"使命感"。尤其对年轻学者来说,自诩"知识人",无异于"假大空",有种置身于特权阶层的虚幻感,他们宁愿称自己为"庶民"(日文,小老百姓之意)。可另一方面,站在中方的立场,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语境出发,说自己不是"知识人"(或"知识分子"),便等于放弃对现状的社会与政治的责任。最终还是日方妥协,接受了所谓"知识人的使命感"的命题。尽管自我感觉有些"浮",但确乎更契合该学术项目深层所暗含的问题意识。

第 21 页 / 共 51 页

^{4 《}作为方法的中国》(「方法としての中国」),岩波书店,1989年6月30日,初版。

但既然是一场知识运动,必然有过于精英化的问题,难以真正"掌握群众"。别说群众了,甚至连知识精英以外的精英也未必"掌握"。据笔者的友人、当时正在北京留学的日本共同社记者回忆,1998年春,在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事务所召开的"中日知识共同体"主题学术讨论会上,作为特邀嘉宾演讲的佐藤嘉恭大使把日语的"日中知的共同体"误解成了发音雷同的"日中血的共同体",并当场借题发挥,一番"日中两国是鲜血结成的共同体"云云的阐释举座皆惊……

过度的精英主义,使这场名为"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学术实验无疾而终。从其后出台的、借助两国外交、政治力量得以推进至今的、诸如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等学术工程的成果来看,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知识"交集"委实有限。这种勉为其难的现状反过来也折射出那场 15 年前的知识运动的"理想主义"一面。

图 1 为沟口雄三照片

MUSIC 音乐

管风琴音乐会琐记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 (加拿大·温哥华, huiyuanma@gmail.com)

(-)

弹管风琴多年,也算个热心听众,无论教堂礼拜还是音乐厅里的管风琴演奏会,大大小小的机会能听尽量听,看看能否有所收获。但我不得不承认现场吸收管风琴音乐是件难事,甚至,如果对作品不熟悉、作品又足够复杂的话,抓住音乐脉络简直不可能。管风琴这个乐器本来就有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它的"现场感"太强,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这个乐器必须在现场听(虽然我并不同意),另一方面它的主流曲目要么是巴赫时代的赋格,要么是高度复杂和喧闹的浪漫派作品(比如李斯特、弗朗克),这样规模的作品,只能供人反复倾听和研究,而现场能领会的东西太少了。内行能不时捉住主题,已经算不错,外行大概只能注意到花里胡哨的音色变化,外加"恢弘的气势"。

所以,尽管管风琴作品中也有不少比较肤浅、只求气势的作品,但对其中的经典我一直这么看:它的意义,主要在于"重听"、"分解"和"研究"。这和它的华丽外表正相反,然而这确实是我的心得。

很意外地,半年多以前,一位热爱钢琴的朋友,正巧在深圳音乐厅工作的周孋小姐跟我沟通,商量可不可以在深圳开一场演奏会。我是个保守的人,不敢奢望这样一场演奏会对观众有何裨益,而只能自私地估计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对自己有没有一点好处?代价是明显的,在准备曲目期间,恐怕没什么心思学新作品了,但好处是,能把过去自以为学好了的作品,再精研一下。钢琴家普莱亚说过,"只有表演过的曲目,才算真正学会。"是这样的,要不怕困难和失败,去经历所有可能的曲折,包括舞台上的紧张、对新琴的适应、现场音效的调整等等,这一切难道不是音乐生活的一部分吗?何况管风琴演奏在国内如此稀少,为什么不利用所有机会,向观众做些可能的推介呢?也许作用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有所作为总胜过不为。

曲目很快就定了,全部是巴赫,当然包括人人必弹的巴赫名作,BWV565(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谢天谢地,巴赫还有这么一首进入手机铃声的作品——虽然大家熟悉的只是托卡塔或者赋格的开头。另外从那组著名的"舒伯勒众赞歌"中选了几首,剩下的几首是一般听众不太熟悉的作品,但我早早公布了曲目,暗暗希望有心的听众会自己找找相关的资料。

我自己呢,这个准备的过程,不用说有不少烦恼和挫折,最初历求完美,接近完美之后却又厌倦退步,尔后总结经验喜能进一步提升,大概就像任何人准备一场钢琴比赛一样。我的压力比钢琴家小多了,因为管风琴演奏的批评和竞争显然比钢琴界少得多,但和音乐搏斗、共生的过程,并无二致。我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对他们(演奏家或者指挥家)而言,生活和音乐是互相渗透、互相放大的,概念和标签都要变成具体的声音才有效。这个从想和听到做的过程,对人的影响不可小视——音乐和人互相进入,互相纠正,音乐形式终将成为生命形态的反映。而他们被音乐"扰动的"人生,又自然地为音乐构造了"上下文"和文化基因。如今我的生活正在真实地"被扰动",从中我经历着担忧、自我怀疑和来自音乐细节的营养,以及不可避免的厌倦。

房间里摊开了乐谱,这样有空的时候就可以不时瞥几眼,清早也可以打开,从各种角度和各个段落读读想想,希望音乐的线索和逻辑能够深嵌入心。我平常就喜欢看钢琴家的演奏录像,最近看得更多,在他们严峻或者潇洒的表情中,我试图给

自己模拟一些心理体验。比如从舞台上"退休"的著名钢琴家古尔德,他彻底回避了"现场"对音乐的干扰和众目睽睽下的表演,其实这样的拒绝之态并不难理解。但也有钢琴家说"舞台就是我的家。我爱舞台。"同样是大师,对舞台的态度可能各持一端。有人置之度外,只顾沉浸在音乐中,有人不时关注听众反应,调整自己的表达。音乐和舞台,真是难解难分的冤家。音乐这个程式会发展到今天,把听众、演奏家和作曲家清清楚楚隔开,最残酷的是把演奏家抛到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等人挑错。舞台对演奏家而言,也许是荒凉的,因为台下有谁能分享那种体验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大家在一个空间里试图获得妥协,但仍然各自感受各的,其间的壁垒无法消融。

 (\Box)

好,不想这么多了——老师有时就批评我"想得太多"。其实我往往劝自己,索性把音乐当成体育或者舞蹈好了,让音乐自然地从身体中化出,让自己和听众一同惊讶。

美国音乐学家罗森在《钢琴笔记》一书中说,"有一次听音乐会之前,有个朋友用胳膊肘戳我,'如果你把贝多芬锤子键琴奏鸣曲开头那句大跳弹错了,可怎么办?'"

我看到这里不由会心。在巴赫那首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中,我最怕哪段弹错?是赋格中两手交替演奏的音阶。这一页其实最简单,只是不能忘记换键盘,另外因为是单手轮换着弹,一有错音便昭然若揭。而它在音乐上因"简单"而获得的鲜明效果,算是巴赫作品中比较少见的。其实,很多学者都怀疑这首曲子并非巴赫所作——我还没有那么大胆,但也感到,巴赫作品中这样的处理实在太特别,也许在他的作品中再也找不出几个例子。

奇怪的是我对这段一直有心理障碍,开始是嫌简单懒得多练,总是跳过去,后来不时地出错,以致于最害怕它。幸运的 是,在台上没有出错。

但是,深渊一般的音乐,总有许多死角在等待你——在一些平常准备得非常好的地方,一些因为太顺利而不必准备的地方,或者因为音乐的丰富、柔软而无法预测的地方。所以演奏家、教育家们,不仅终生追求音乐,还要设计那么多琐碎的操作方法,力求对所有漏洞严防死堵——不仅为防出错,而且要保证音乐表达能够脱离技术羁绊,在自由状态中迸发出来,不然的话,努力寻得的鲜活表达,到头来却因技术失误被窒息,岂不冤哉?而在学习、练习的阶段,人和音乐虽有冲突,总还算互动着友好相处,但到了舞台上,经典作品就流露出残酷性:必须弹对,不能弹错,因为音乐已经经典化了,它现在就是圣经!固然音乐中的激情可以吸引住听众的注意力,弥补一些失误,但管风琴给个人的空间比钢琴小多了,对错误的容忍自然也小得多。

别的演奏者也许和我有类似经历:有时在练习中获得非常好的状态,激情饱满又技术准确、又有生动圆满的音乐感——可惜,最好的事情没有发生在舞台上,并且谁也不敢保证在舞台上总能复制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当你在技术上非常可靠的时候,往往已经失去了激情。但单靠激情来带动音乐而没有技术上的稳妥保险而上台,谁敢?

你瞧,内心和音乐的挣扎,只有在舞台经验的激励下,才能如此淋漓尽致。

演出现场的观众和我预想得差不多,有比较懂音乐的,有不太懂的,有比较耐心的,也有全无耐心的——和我自己做观众的时候类似。听音乐会的状态,对我而言同样变动不居,有时能把声音和灵魂一同吸收,也有时全无感受,完全被音乐抛下。舞台气氛带来的变数太多,谁也说不准一定会发生什么。而演奏者拥有的,只是忠实的心意。

演出前有个小小插曲,就是我抵达深圳不久,在音乐厅的小廖带路下去书店转转,买到本赵晓生的《巴赫解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年 8 月),大喜。赵先生的巴赫著作,我一向见了必买。拿回旅馆看看,在细致的谱例分析和"索隐"中突然豁然开朗。几天时间里,无论经历着轻微的"上台恐惧"还是因为缺乏信心而焦虑,这本书都像一颗铁锚,牢牢定住我的情绪。既然精研音乐之路还如此漫长,那我何必过于纠结此时的得失呢?我准备的巴赫曲目看似有限,但它们背后的潜台词,不仅包括巴赫的风格,还有无穷的理论、历史和诠释的话题。难道我不该庆幸,这样的复杂,是音乐留给人的礼物吗?我,或者别的管风琴演奏者,从教堂到演奏厅弹琴,从寂寞中来到舞台灯光下,似乎环境骤变。而巴赫的音乐不理这些,自在地生长。所以,一切表面的变化和纷扰都是浮云,这一点,已经无声地写在所有的



杰作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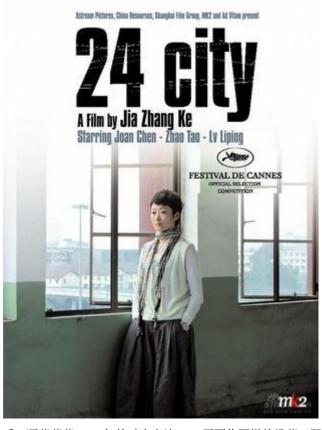
FILM 电影

当我们谈论城市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观察员 言一 (成都, richard7briner @gmail.com)

几乎是猛然发现,贾樟柯的近两部长片都是关于"城"的。于是在看过《海上传奇》之后,又从硬盘里翻出下载已久的《二十四城记》。看过之后,却是一阵接一阵的麻木,出乎意料的麻木。两部影片里,竟没有太多足以打动我的东西。

正如在《二十四城记》里陈建斌所扮演的受访者所说的 那样:被拍摄的客体——420厂,其实是一个与成都这座城 市没有太大关联的一个社区。就其当初巨大的规模而言,它 更接近于19世纪西方的新兴工业市镇/城镇。尽管有成千上 万的人在这里工作,上学,生活,但它却恰如芒福德所言般 不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特征,即:"这个地点的本地社会 遗产要相对集中,这个地点可以提供延续不断的社会交往和 社会互动, 并且, 通过这种交往和互动, 可以把本地人口及 其活动提升到更高的境界里去。"(芒福德:《城市文化》,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年, 187页) 从 420 厂被冠以"大 院"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词汇上面就可看出,芒福德所看重 的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虽不致完全断绝,但亦可说明其稀 少。故而,420 厂所占据的整个区域,与其说是一座城(city), 不如说是一座依附于成都却又与之割裂的集镇(town)。也正 因为此, 贾樟柯在片尾以诗句对成都的致意, 便显得颇为唐 突,以至于不少人认为那其实代表的是作为编剧的诗人翟永 明的一丝心声。



西方的城市史里,80%的工业城镇都在一时的突飞猛进之后,凋落萧蔽。50年的时光亦让420厂面临同样的没落。即便只是一座集镇,几十年的兴衰起伏,亦有太多故事可以倾诉,值得探寻。当经济社会地位的下降,日益拆去了昔日辉煌的大院高墙,420厂的人反而开始更多地试图与成都这座城市相融,反而可以看到更多的社会互动。可惜的是,这一切在贾导的片中,几乎是片空白。大多数在采访中的故事都始于1958年,止于1980s;然后就直接来到了现在。仿佛从1990-2010这中国社会变化最为激烈的20年被某个不知名的黑匣子给吞了进去。一并被吞入的,还有在这激烈变化中的种种挣扎,冲突,妥协与融合,一个个家庭的新愁与旧乐。

除了最后属于赵涛的 20 来分钟,贾樟柯在采访中所呈现出的当下,着墨可谓很少;而那些散落全片的拆迁景象,则完全地与过去断裂,成为一种十分平面的当下。如果说贾樟柯试图在影片当中呈现的是一段消逝的历史或回忆,那么我在片中所看到的历史与回忆是一种经过雕琢的历史,是一种俯视之下的回忆。我其实完全不介意片中的受访者是否是真有其人,还是由明星扮演——事实上,我觉得陈冲演的挺出彩的。她的出现与自己当年出演的《小花》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呼应关系,算得上是片中妙笔;我更加不介意他们口中的故事又是否真实。我真正在乎的,是他们的生活曾经如何地与整个区域的各类建筑,各种空间密切相连;否则搬迁所带来的不舍,甚至创痛便无从说起;我在乎的,亦是他们口中的故事如何藏身于他们当下的生活细节,而随时都可能被开启(unfolding),被曝光。

整部片中,贾樟柯所做的却更多是在掩埋,关闭(bury, folding)。通过呈现一些。不呈现一些的选择,他将许多东西

关在了不知名的黑匣子里,且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于是在影片中,作为集镇的 420 厂在 50 年后与成都依然断裂; 420 的人与空间近乎天然分离。我们或许看到了 420(人)的过去,看到了成都(建筑)的现在,却终究无法将二者相连。那被贾樟柯掩埋的 20 年,我相信足以让许多人唏嘘一生。严格意义上,历史与建筑在贾樟柯的这部《二十四城记》中其实是缺席的。



当贾樟柯进而面对上海,面对这座城所承载的无数传奇,他无疑面对了更为丰富,甚至称得上瑰丽的素材。只是,面对这样的素材,我自己怕是要手心出汗,忍不住发抖的。

在《海上传奇》中,贾樟柯延续了他所谓 "伪纪录片"的手法,让赵涛在片中扮演一个游荡的鬼魂,并在片中穿插,引用不少老片,禁片,颇有几分致敬的意味。老片/禁片,作为史料的一种,与当下的影像平行呈现,似乎实现了某种时间轴上的串联。只可惜,这样串联也几乎仅仅止于时间轴,而与生活相脱离。影片的绝大部分,依然是由受访者在讲述自己的过去的,那些与上海有关的经历,故事。我们或许能从这些故事里,感受到这些受访者与上海之间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是属于过去的联系。关于他们同今日上海之间的联系,我几乎察觉不到。换句话说,就贾樟柯所选择的这些受访者而言,他们与上海的联系更多是一种被动选择的结果。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出生,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恰恰都出生在上海。更为有趣的还在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同样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上海。于是我的问题便在于:为何不选择那些主动来到上海的人呢?他们中的不少在选择上海这座城市时,一定有着某种深思熟虑,而这种深思熟虑在我看来,恰恰是关于当下的上海的,或者某个时刻的上海的。又或者,有谁能告诉我,是上海的什么造就了陈丹青,造就了韩寒?至少,在这部《海上传奇》里,我看不见,也听不到。

贾樟柯也许成功地呈现了一个个传奇,但上海作为一座城市却不见了。尽管,那些传奇确乎然都是关于上海的,但我却 全然感觉不到上海作为一个城市,有血有肉般的存在。

一个朋友曾说: 贾樟柯不是上海人,所以在破题上,他就输了。然而,结合《二十四城记》来看,我更倾向于贾樟柯输在他不懂城市,不懂如何去谈论一个城市,输在对微观生活的远离。从《世界》,到《三峡好人》,再到如今的《海上传奇》,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贾樟柯对于中国所历经的转轨,变迁是一直有所关注,也一直致力于去呈现。只是,从深圳,到三峡,到成都,再到上海,他的影片当中却越发地透露出他的力不从心。要知道,早期的三部曲,所拍摄的都是他自身浸淫多年的小城生活,而从世界乐园到如今的上海,我们看到的是区域的日渐扩大。在我看来,只是经过了1-2年的准备就试图去谈论一个城市是狂妄的。城市,如同博尔赫斯笔下的沙之书,翻之不完,阅之不尽。只有长期地沉浸其中,才可能在数笔之内勾勒出一座城的几分神采。否则,便只能如贾樟柯一般在一个更为宏观的层面,去建构一个想象中的,平面的城市。

不经意间,联想起建设部幕僚陈淮最近的发言。如果一切成真,我们在面临城市,城市史这一命题时,必将更加的手足 无措,无从谈起。

图 1 为《二十四城记》海报

图 2 为《海上传奇》剧照

INTERVIEW 访谈

我的生命是这样被耗费的——钟叔河访谈

特约撰稿人 贾葭 (北京, jiajia8o@gmail.com)

编者按: "独立阅读"特约撰稿人贾葭,2006年3月前往长沙,拜访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先生。这篇访谈整理于该年4月,没有在国内媒体上刊发,"独立阅读"在此首发,以飨读者。

初见钟叔河先生之时,他的随和与洒脱,似乎刚刚跃出纸面,和文字里的钟叔河合二为一,有种恬淡冲和的气息。他坐在宽大的餐桌边上,慢条斯理地享受着早餐,同时用浓重的长沙话说,"边吃边和你谈吧。"那时候,窗外正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房间的光线有些暗。他的夫人朱纯则安静的坐在一旁倾听。

房间很大,沙发上方悬挂了一幅黄永玉题赠的水墨画,整个房间都氤氲着空灵的气息。他从餐桌移步到沙发,坐下来,就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与钟叔河聊天,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虽然他的话我听不太懂。事先准备的采访提纲基本作废,谈话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钟叔河出身平江书香门第,自幼苦读百家之书。1949年8月,他到《湖南报》社新闻培训班接受培训,后来成为该报的

编辑,直至1957年被打成右派。 1958年被"双开"之后,他在长沙以拉板车为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书籍,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与周作人开始书信联系。

1970 年他再次被打为"现行 反革命",入狱 10 年。平反出狱 后,即至岳麓书社任编辑,1989 年离职。1985年,他主持出版的 《走向世界》丛书甫一杀青,就 在文史界引起极大反响,好评如 潮。

此后,他陆续主编的《知堂 书话》、《周作人文类编》、《曾国 藩往来家书全编》、《林屋山民送 米图卷子》、《周作人散文全集》 等书,更为学界瞩目。他不无遗



憾地说,自己真正工作的时间只有10年。如果给他更多的时间,还可以做更多事情。

钟叔河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出版人。读书、编书、写书是他一辈子的事情。数十年的牢狱生涯,使得他有大量时间去阅读和思考。钟叔河坦承他的出版选题是有偏好的。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着力良多。钟叔河一辈子致力搜罗周作人的著作,不止一遍的阅读和揣摩。他来主编周作人的书,再合适不过。故而钟叔河的文章,颇得苦茶老人之气。

黄裳先生为钟叔河《书前书后》写的序里说:"作者又是善于文章的。很沉痛的话,却闲闲落墨,别无渲染。如果寻根溯源,这种笔路风致,可以到东坡、山谷、放翁的题跋里去找。有如人的面目表情,有的只是一微笑,一颦蹙,而传达情愫的

力量却远在横眉怒目之上。"

钟叔河在《〈钟叔河散文〉自序》说,"按文学圈内的标准,这里可以算得上正宗或主流散文的,恐怕没得几篇。好在我这个人从来就是不那么皈依正宗投入主流的,所以也就随它了。"其实钟的文章风致,在五四之后的数十年,正是中国新文学的正宗。

钟叔河住在都市一隅的 20 楼上,门首有"念楼"之匾额,出自周作人手笔。"念楼"二字即谐"廿楼"之音。他平日很少下楼,只是读书和写作。

我做出版出于偶然

问:大家知道您,主要是因为您在八十年代出版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很敏感的书,在当时需要冒一些风险。比如曾国藩家书,胡适以及储安平的书,还有周作人的书,当时是怎么有这个想法的?

钟叔河: 首先我认为他们这些著作,有出版的价值和必要。中国在 1949 年以后,就没出版这些书。当然,也不是说有出版价值,就是对他们的全盘肯定。不能对任何人做出全盘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这些人的书,在以前是出版禁区。但是,举例来说,研究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一定要看胡适的著作;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一定要看曾国藩的著作。既然这些书长期没有印,为了文化发展的需要,就要印出来。我只写前言和后记,我只是出版它们,只是印出来。如果不印,也就没人去评论他们。在当时确实冒了一些风险。



问:这些书当时是怎么通过审 查的?

钟叔河:储安平的书是一本小书,当时出版局不一定知道储是谁,没人注意这个小书。在 80 年代初,储安平还是没有改正的右派。我是第一个出他的书的。胡适,曾国藩,我都出的很早。有人为这个还发表文章批评我,说曾国藩是汉奸,你钟叔河出的是汉奸的书。

这就很没道理,满洲统治了那 么多年,到道咸年间,早已经融和 成中华民族了。按照他这个逻辑,

所有人都是汉奸了,林则徐也是了。说周作人是汉奸还是有道理的,他当时确实在伪政府做过事,但我们出版的只是他的文学作品,作者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是两码事情,这个要分开看。

问: 您是如何开始出版生涯的?

钟叔河:我做出版是出于偶然。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18岁时全国解放。本来我要念书的,也没想过以写作为职业。 我青年的时候对科学很感兴趣,直到现在。我一直是一本地理杂志的订阅者,也对考古学很有兴趣。

我以前没想过做传播和出版。出狱之后,我不愿意回报社,就是反右前的那个单位。北京的《历史研究》让我去工作,我也没去。后来就去了岳麓书社。我 27 岁时成为右派,39 岁成为反革命,老伴也是右派。这些错案 49 岁时才改正。按照中国的古话来说,50 岁就是老年人了,我的生命就是这样被耗费了。

问:大家都称您是出版家,真正的出版家应该是什么样的?

钟叔河:刘知几在《史通》里说,"史才须有三长,才也,学也,识也。"搞出版传播也一样。做编辑问等工作,才、学都要,但更重要的是见识。才、学、识三者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的,要有分析的能力,我觉得出版家要有这个境界。

现在出版传播的环境已经好多了。当时上面要我回《湖南日报》,那个时候,落实政策要讲组织关系的,调动很麻烦。我们的人事观念和程序还是有体制在约束,出现过很多荒唐的事情,1949年到文革,对境外写信都要经过组织检查的。

比如两个人谈朋友,要向组织上写报告,你不写,他们要干涉。表现不好的话,婚姻都是个问题。我就是在这个体制下生长的,18岁就进入体制,我如果有你们这样幸运,可以做更多的事。

我能理解周作人

问:许多人说钟叔河喜欢出汉奸的书,您怎么开始跟周作人交往的?

钟叔河:现在对周的评价还比较到位,以前说话都是吞吞吐吐,怕被扣上帽子。周作人虽然和日本人合作过,但他还留下了某些思想、某些著作。我并不完全肯定他,我就是印书。人归人,文归文,有价值的东西,不能不读。

评论周作人,也要找到他全部的资料,也要看他全部的文章,然后才能评价,不能乱骂。不把书印出来,怎么评论?我 不发言,就保持了继续出版他著作的可能。如果我变成论辩的一方,别人就更有可能阻止我印了。

从前中学国文课,有周作人的文章,读起来很亲切。大家都说我有周作人情结。我在拖板车的时候,看到《希腊的神与英雄》,书上没印周作人的名字,署名是"周遐寿"。这本书上,希腊诸神的名字,和我们现在通用的不同,现在管太阳神叫"阿波罗",这本书上不是。我就给出版社写信,通过出版社的转达,周作人就回信给我了。

问: 您现在怎么评价周作人和他的著作?

钟叔河:他是五四期间成名的新文学家,当时我还没有出生。后来他不仅写信给我,还给我寄书。我们讨论过很多问题,周作人认为,我能理解他。周作人去世的时候,我不知道。因为文革开始后,我就无法写信了,好像他是 1967 年去世的。

我的确对他很看重,他的文学观、妇女观、儿童观都比较适合中国。现在我们不可能有他这样的学术修养了,他通晓日文,英文,希腊文,古英文和古日文都很精通。日本早期用汉字,但日文语法和汉语是不同的,他都能认识。

他翻译的名著也很多。周作人在文章里提到的书目很多,大部分我都没看过,书名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些外文书我永远 没办法读。

思想和文化就应该自由交流

问:《走向世界》丛书,您还想不想继续出?这是个开创性的工作,和现代化息息相关的。现在这个时候,正是这类书籍走俏的时候。

钟叔河:现在还没有出版者想出,但总会有人出的,我的资料都在。《走向世界》丛书原定一百种,应该要出齐的。我们中国或者说中华民族的性格,一直是内向的,保守性很强。世界上古老的文明,只有中国保持下来。甲骨文里面的"中"字就是这样写的,几千年没有变化。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的文字后来都变成了阿拉伯文,玛雅文化还没有文字。但是汉字保留了下来。不仅把优点保存下来了,缺点也保存下来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凝固力很强,不能融入到世界去,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知晓外界。

这个《走向世界》丛书出版的时候,也就是我开始搞出版的时候。这些书都是我自己选择的,直到 **1989** 年被停止工作。 我只做了 **9** 年出版。开始我还没资格确定选题,有很多笑话。

那时候选题不够,我选的每一本书都很单薄,一年至少要出 20 本才行。但是领导只准我一年出 4 本,我就申请出 8 本,占掉我来年的名额。他们还是说不行。每本书前面,我写了导言,有人不允许,说你钟叔河想搭车发表自己的东西。这样的 笑话还有很多。中国糟糕就糟糕在这里,做事不容易,要消耗大量的无用之功。

问: 现在的出版社,多数以卖书号为生,而且鱼龙混杂,码洋那么多,却很难见到好书。

钟叔河:许多出版社靠卖书号,其实比原来的情况还好些。先前的人民出版社,到底下各省的人民出版社,层层控制,许多书出版不了。

现在的出版自由事实上是在扩大的,言论自由就是这样开始的。即使一些出版社在出垃圾,也比以前什么都不让出好些。 鱼龙混杂,没有糟糕的鱼,就没有龙,一潭死水更可怕。泥沙俱下也好,一些侵犯知识产权的,瞎编乱造的,为了赚钱的, 以后肯定会被市场抛弃。

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好书,比如余英时和唐德刚的,早就应该引进的。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书是文化的载体,思想文化就应该自由交流,但是现在的自由还是很不充分的。现在我们大家做的事情,就是争取思想和出版的自由。

我不关心政治

问: 我记得张中行先生给您写过一副对联,"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

钟叔河:这是个集句的对联,是张中行书写的,意思就是中国不能再折腾了。上联是辛弃疾的,下联是姜白石的,这是 1989年春夏之交之时请他写的。我的感觉就是,"最可惜一片江山"。谁不爱国?我们都是爱国的,我是黄皮肤,黑头发,怎 么不爱中国呢。爱国就得努力使得国家可爱。

以前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时候,在白色恐怖之下,蒋介石提出什么"新生活运动",要背"党员守则"等。中国很奇怪的,



经常搞一些政治口号,想用格言、顺口溜来治国,这样的政治智慧 比较低,代替不了孔夫子。孔夫子很有内涵的,有非常深刻的哲学 和文化内涵,但是现在的一些东西,就非常浅薄。

问: 您现在最关心什么问题?

钟叔河:我比较关心社会,我并不关心政治,这也不是明哲保身。我对政治不热衷,我没有兴趣,看热闹都不想看。要关心,就要参加进去,我却无此精力,亦无此兴趣。我比较关心社会和人,我只喜欢思考,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接触政治。自由是什么,就是由自己,这是胡适的话。

自由民主这个东西,不是什么理论,而是生活的要求。我最看 重周作人的,就是这个。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只是人情。人的 本性要自由,这便是人情。不能按照指挥棒来发言,生活要多样性, 这是人的内在要求,法西斯是违反人性的。

问: 您是不是不喜欢谈狱中的事情,入狱的事件,当事人可能还在,所以您不愿意说?

钟叔河:我经常给人说狱中的事情。那时候,有书看,潘汉年也关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待遇不同。劳改队是个小社会, 我在机械制造车间,我搞绘图,劳动不是很苦。我到现在绘图的水平还是专业级的。

有几个年轻工人对我很同情,经常拿书给我看。《四书》和《通鉴》就是在那里读的。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也都是那时看的,还看了一些内部书籍。那里有很多故事,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以后我也许会写下来,现在先把《周作人全集》编完,再去写。

中国很多事情都是黑色幽默,有个知青被判刑,理由很简单,他把李商隐的"东风无力百花残"写在笔记本上。他们说"毛主席讲东风压倒西风,百花齐放,你却说东风无力百花残,太反动了",他就被判刑了。

问: 我看您的读书笔记还是很关注现实问题的。

钟叔河:我关心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出版和舆论的现状总归是要变的,我并不悲观。现在年轻人在某些方面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了。他们会给中国带来变化。现在社会有缺陷,比如自私,不讲诚信,把优秀的东西都扔掉了,发扬了一些丑恶的东西,提倡检举揭发,大义灭亲,对民族的伦理道德损害是很大的。

我还能做一些事情

问: 近代湖南是个推动历史进步的地方。大家都说您是湖南人的典型。

钟叔河:我算不了什么,湖南人的代表是李锐,我做的事情很少的,首先做事的时间就很少。我这个人,作家和学人都 算不上,大家说是出版家,也不能算。

我就出过曾国藩、周作人的书和《走向世界》丛书。后者我还有点资料,如果不很快死,也许还可以做一些事情。有时候也还在写点小文章。《周作人文集》,我都把稿子发过去了,正在看校样。

问: 您日常都有些什么活动?

钟叔河:我平常很少下楼,10多天才下一次,理发才下去,就是看书,写字。我老伴用电脑,我看电脑眼睛不行。我不是很喜欢运动,这个台球桌,家人希望我平时多运动,也很少用。

2003年,被公园摩托车撞了,管理人员骑的,撞飞了好几米远,幸亏落在铺草坪用的草垛子上。但是还是受伤了,眼睛不行了,看不了跳跃的东西,比如电脑上的字。朱纯现在用电脑,我用不了。不比你们,你们年轻,世界还是你们的,你们要乐观,向远处看。

图 1 为钟叔河 2006 年照片,贾葭拍摄

图 2 为钟叔河编辑周作人文集

图 3 为钟叔河漫画头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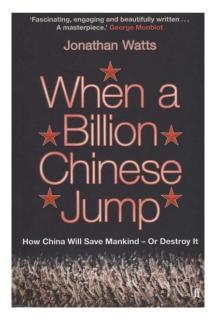
INTERVIEW 访谈

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乔尔纳·沃茨访谈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 (北京, 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当十亿中国人同时跳起来,地球会发生什么?答案是,在那一刻什么也不会发生。然而,当他们从空中落下的瞬间,悲剧就立刻发生了:"如果全部的中国人在同一时间跳起来并落地,这会将地球从中轴线震裂为两截,大家都会完蛋。"《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When a Billion Chinese Jump)一书以这样一个不寻常的问答作为开始。

这是本书的作者乔纳森·沃茨(Jonathan Watts)第一次向人询问关于中国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大约七八岁。我问别人:中国有多少人?"然后,沃茨从对方的口中得到了这个答案,一个足以让小男孩既感到好奇、兴奋,同时也让他有些惧怕的答案。睡觉前,他甚至向上帝祷告:请您不要让所有的中国人同时跳起来。



从孩童时代起,中国对于沃茨来说就始终纠结着这两种感情:一方面是具有吸引力的神秘古国,另一方面,他也感到现代的中国蕴含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力量。

但是,那时的他做梦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来到中国,并且在这里 一待就是7年。

在中国的日子里,他的身份是英国《卫报》的驻华记者,专门负责报道环境新闻。这期间,沃茨几乎跑遍了中国的每个角落,追踪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事件和人物。从山西的非法煤矿,到白鳍豚、藏羚羊的消亡,再到广东省的垃圾处理厂,沃茨的足迹不可谓不广。在中国采访报道的经历,最后凝结成了《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这本书的点点滴滴。

这本书是以旅行记录(travelogue)的形式写就的。沃茨以云南香格里拉为起点,先后游历西藏、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又经上海、山东到达中国的北方,完成了这次规模浩大的对中国环境污染的见证之旅。"几乎中国的所有地方我都去过",他几近"自大"地说。

然而,"旅行"只是这本书的一个外壳,《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的真正内涵在于,它通过生动的一系列新闻故事和旅行见闻提醒中国人: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性以及环境污染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伤害。书里记载,当沃茨在一座垃圾回收厂采访时,发现了

大量从国外"进口"的垃圾和塑料废品:"这里有法国的乐高玩具、英国特易购的牛奶盒、马克斯思班塞的橘子汁瓶,俨然就是一个世界的大工厂"——抑或是垃圾场?这些塑料垃圾被回收、研磨、再加工之后,成为了人们使用的储物箱或包装纸,而生产它们的代价是环境的污染以及当地儿童的血铅含量高于美国标准的 50%······

这些旅程让沃茨进一步确认了自己早年的担忧:随着中国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强大,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家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已经成为了中国崛起的最大"副作用"。"我来的第一年,中国的 GDP 超过了法国和意大利。第二年超过了英国。"但对于身在中国的沃茨来说,幸福感并没有和 GDP 呈现正比关系,相反,他更担心的是自己和两个女儿的身体健康:"这里空气最糟糕的时候,学校在课间都不敢放她们出去。而我则在北京第一次患上哮喘。"

沃茨以亲身的经历在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愈加密切以及自身的崛起,想要在国际舞台独善其身已经不可能,即使只是在环境领域,世界的其他部分受到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比如日本受到中国大气污染的影响、中国淡水污染对临近海洋的污染。"在中国你可以目睹西方两百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在这里瞬间完成,但马上你意识到,

"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跳起来'的那一天了,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沃茨这样问。而答案,就

中国也在世界环境危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这本书里。

问:我很好奇你在中国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还是有同事的协助?

乔尔纳·沃茨:实际上我在中国有不少同事。《卫报》对中国的话题很感兴趣,因此这些年增加了在中国的记者数量。在环境新闻这一块,2008年我们扩充了一倍的记者数量,当然,我说的一倍仅仅是指从一个变成两个(笑)。我们两个都有来自中国的助手,这帮了我们不少忙。至少我可以更专注于我自己的报道领域了。

正如大多数新闻记者一样,我们每天要阅读中国的报纸,与这里的记者、NGO组织和官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和信息渠道。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



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得确定自己能到现场去,你不能老呆在北京。

问: 写书的过程以及采访困难吗? 环境问题在这里似乎日益变得"敏感"。

乔尔纳•沃茨:这还真不一定。在7年前,假如青岛爆发绿藻之类的灾害,政府肯定不会准许你去报道这事,那对他们来说太难堪了。不过现在,他们会热情地对你说:来吧来吧。然后把你请到船上,看着他们清理水里的绿藻,他们很愿意展示自己对环境问题的关心。但真正改变较大的是,外国记者在中国有更大的活动自由了。在 2007 年之前,我如果要去北京之外的地方都需要经过"外办"的准许,这真的很麻烦。我曾经在没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自己去了别的地方,结果有3次被当地公安请去喝茶。虽然我并不想喝他们的那杯茶,但我没有选择余地。

问: 你在中国去过的地方当中, 哪里遭受的环境问题给你印象最深?

乔尔纳·沃茨:很难一句话说清,各个地方遭受的困难都不一样。在河南,你会感觉到这里的空气受到了过度污染,人口也过多。在山东,农业对水的污染所造成的绿藻泛滥的情况也很惊人。在黑龙江,那里的人们伐木过多,森林覆盖率下降成了一个问题。而当你到了广东,你会发现人们过于关注金钱,不惜进口外国的垃圾来加工从而获利。因此,你很难一时说清哪里情况最严重。但如果单就污染造成的损失来看的话,我觉得很可能是上海。

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消费过多。本来消费一类的问题属于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所有,但是随着西方国家把污染型工业(dirty industry)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我们看上去就会显得更"绿色"一些,但是它的代价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污染转嫁的地方。现在上海的人均碳排放量是纽约的两倍,北京和其他中国大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

问:问题是,西方经历工业化的时候,甚至还不存在环境问题这个概念。而当中国现在经历类似的进程时,却不得不考虑环境的成本,你认为这公平吗?

乔尔纳·沃茨: 当然不公平,这甚至可以说非常不幸。每一个国家都经历过发展所谓的污染型工业的时期,像 19 世纪的 英国,20 世纪的美国,高速的发展带来了环境灾难。但是,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到达某个峰值的时候,换句话说,当他们有足够的钱的时候,他们会放缓步伐,关注到环境问题上来。但通常这些国家有两种做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加大对环境的治理,发展回收制造业。这是个聪明的办法,但会花很多钱。

还有另一个很多国家采用的办法,就是把污染型工业丢给另一些国家,这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比如英国当初把污染型工业转给了欧洲,欧洲又转给了美国,美国最后又把污染转移给了澳大利亚、俄国、日本这些国家。现在,它到了中国的手里。但是,中国又能把污染型工业转给谁呢?于是,向国外转移变成了向国内转移,东部沿海地区就把污染严重的工业向甘肃、宁夏这些内陆城市转移。这公平吗?当然不公平。

问: 总的来说,存在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吗?

乔尔纳·沃茨: 众所周知,使用核能存在很大的风险; 太阳能技术,尤其是光电版的制造会带来新的污染; 风能发电的利用率又很低; 而清洁燃料的技术又非常昂贵,并且还潜藏着碳排放过多的可能性。可以说,每种能源的替代方法都各有利弊,但并没有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法。

关键是,环境问题需要你在有时间并且有钱的时候才有可能去解决。我想和 5 年前比起来,北京的环境已经有不少改善了。作为一名记者,我能看到中国政府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在推广清洁能源,利用新的环保技术方面,政府现在可以说做的非常好,但在另一方面,如何从消费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文化的层面,我们怎样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消费行为。在这方面,中国并不需要变得更像西方,反倒是西方更应该像中国。但问题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现在所有和中国做生意的国家都希望中国消费更多,这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问:《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是个足以让政府感到敏感的书名,看来中文版出版无望?

乔尔纳•沃茨:我不这样想。虽然书里很清楚地提到了这个说法,但现在并不是只有中国在这样做。实际上欧洲也有十亿人跳了起来,美洲也有十亿人跳了起来,人类在把地球向某个方向推去,中国现在也参加了进来。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如何协调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你怎么赚钱和你生活的土地是否健康,不再是没有联系的了。

图 2 为乔尔纳·沃茨近照

When a Billion Chinese Jump: How China Will Save Mankind – Or Destroy It, Jonathan Watts, Faber and Faber, July 2010.

INTERVIEW 访谈

科幻的使命是创造一个公平自由的世界——韩松访谈

特约撰稿人 灵子 (北京, liufango815@gmail.com)

前往成都的飞机上,客舱里的电视一直都在播放刘德华演的《未来警察》。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到科幻片,而且是中国科幻片。问空姐,笑答:"地球人都知道成都要开科幻大会呀!"

8月6日晚,科幻作家韩松在微博上如是写道。仅仅看文字,便想象得出他听到空姐的回答时,露出怎样腼腆又按捺不住得意的笑容。

次日在中国幻想小说最高奖"银河奖"颁奖大会上,位列当下科幻"四大金刚"之一的韩松(另三位是刘慈欣、王晋康、何夕)起身致意时,全场发出巨大的欢呼声,丝毫不亚于追捧日韩明星的粉丝们。

成都一行三天,他获得两项大奖。短篇 小说《绿岸天堂》获"银河奖"读者提名奖; 与刘慈欣并列成为世界华人科幻首届"星云 奖"最佳科幻作家。不到一个月前,他则以 短篇小说《暗室》获得中国科幻"星空奖" 最佳科幻短篇。

与其他从事理工科相关职业的科幻作者 不同,韩松白天的工作是新华社对外部兼中 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时时关注国内外各 种政策变动和突发事件。夜晚他才转变为科 幻创作者,将白天的荒诞感受融于写作之中。



他会用温家宝的"仰望星空"来概括科幻创作者的特点,也会随手拈来国际形势和国内时事新闻作为谈话例证。他人观 之以为生活分裂,他自己却觉得这是再一致不过的事情了。

对于当代社会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他都乐于将其看作一部科幻作品去接受。"我们其实都是一群辛辛苦苦土里刨食的农民,这个农耕民族现在集合在一起搞重工业,还发射了太空飞船,这本身就是很有科幻气质的。"在一次访谈中他说道。在他看来,现实世界发生的科幻故事越来越精彩,有时远远超出创作者们的想象。

科幻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在他的代表作《2066 之西行漫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中得到最好的诠释。在这部 2000 年写就的作品里,他设定背景为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则衰落了,并预言了世贸双塔被恐怖分子炸毁、美国遭

遇金融危机重创等图景, 只是没想到现实来得比预想中还快。

"中国不适合写科幻,因为这是个太现实的地方。今天甘肃的泥石流已经失踪两千多人,找到尸体 127 具······在这样的写科幻,真的很不容易。"8月8日晚,鸟巢在庆祝奥运两周年,韩松手捧着金灿灿的最佳科幻作家奖杯,最强烈的感受是"受之有愧"。

接二连三被中断的科幻文学

问:前不久《科幻世界》以公开信方式要求主编下课的事件,无异于中国出版史上一次大科幻。这也让大家忽然意识到 科幻文学在国内其实是有大量读者的。但以前我们往往不把它看做主流文学的一种。科幻在国内的发展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为什么它没有像其他文学分支一样发展壮大起来?

韩松:科幻文学说起来应该属于通俗小说的一种。一般我们说现代通俗小说就包括侦探、言情、恐怖和科幻。但科幻从 一开始在中国的意义就不一样,它是与中国国家命运和国力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国内科幻小说在 1902 年左右产生,一进入中国就不是一般人在写,而是由一连串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来推动的。比如鲁迅翻译了凡尔纳的作品进来,梁启超在自己主编的《新小说》杂志连载《新中国未来记》,发表翻译小说《世界末日记》等等。他们认为中国必须有科学,由科学来救国。

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幻小说描写的主要是中国强大起来后会怎样。比如,顾均正的《和平的梦》。他还写过一些作品, 讲东方国家跟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一过程后来在大概抗日战争时期逐渐冷落,直到五十年代中国赶超英美的时候,伴随着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的科幻小说又兴起了。当时是向苏联学习,以郑文光为首的一批作家,主要写发明创造会给中国带来什么,中国怎样探索未来,包括写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在火星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文革又把这一过程的发展打断了。直到 1978 年,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科学的春天"来了,才掀起了科幻的又一个高潮。第二年,杂志《科幻世界》创刊,一批作品也相继出来,比如《珊瑚岛上的死光》、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后者实际上是向当时的中国人展示了一个科技高度发达之后的美好未来社会,或者说是当时人们理想中的全面小康社会。

不幸的是,1983年反自由化开始,科幻的发展又被中断,科幻小说被指为是精神污染。创作者受到很大的冲击,比如叶永烈从此不再写科幻小说,转而写纪实文学;《飞向人马座》的作者郑文光受到批判之后非常生气,以至于后来中风瘫痪;《珊瑚岛上的死光》的作者童恩正,也在此后出国。全国只剩下《科幻世界》一家科幻杂志在强撑着。

一直到九十年代初,科幻小说才开始重新跳上一个门槛,被称作"科幻新生代"。像王晋康、何夕、柳文扬等一批人都



在那一年拿到了"银河奖"。刘慈欣也在那一阶段也开始创作。在这之前写科幻是很难的。1991年,《科幻世界》杂志社争取到在成都召开"世界科幻协会年会"的机会,分散在各处的科幻作家又聚集在成都,叶永烈、郑文光他们都出席了。这好像给大家打了一剂强心针,科幻小说的创作开始恢复起来。这一时期在2002年达到了一个高点。《科幻世界》在这一年内集中为十年内出现的优秀科幻作家分期做了专辑,介绍了刘慈欣、柳文扬、何宏伟、我等等差不多十二位,在当时特别声势浩大、振奋人心。

2002 年之后一段时间相对比较沉寂,近几年除了刘慈欣《三体》、王晋康

的《蚁生》等的出版好像没有别的太大动静。当然有新的人出来,比如陈楸帆、飞氘、夏笳、江波、迟卉、拉拉、长铗等等,但整体来说还是没有赶上 1992 年左右开始的辉煌十年。上一批人身上有一种更加悲凉的情绪,与国家的联系更紧一点,他们探讨个人命运在大的国家变动下的起伏,探讨科技和国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新一代就比较发散,有些会描写一些纯技术性的东西,有的人会写得很漂亮,但没有附加一些东西,去探讨新世界本身的美和不可思议,而是把更加游戏的观念加进来了。

问: 这个沉寂期的原因在哪里? 好像每一次科幻文学的发展或衰落都直接跟国家现实有关系?

韩松:对。二十世纪初那个时期,在清朝快要瓦解的时候,创作者们是要为中国找到一个新的出路。九十年代的大发展也是一样,当时恰好是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国家经济向着一个很高的方向迈步,带动了一系列的发展,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停止了之前的争论。

现在的沉寂我觉得还是跟经济基础的变化有关。2002 年是十六大召开,2003 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之后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跟之前的想法不同了。一直到去年,"科学发展观"还在全国进行推广,要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这段时间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急剧变化、矛盾非常多、看不太准方向的时期,我觉得这潜在的影响了科幻小说的创作。

问: 具体是什么样的影响? 提倡"科学发展观"不是应该有益于与科学相关的创作吗?

韩松:从长期来讲,它对科幻是有促进作用的,特别是提出要协调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对科幻来说是利好的。但是它不能一下子落到实处,就像转轨一下子转不过来,经济结构的调整一下子也调整不过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是要求一种高附加值,要用高科技的手段及科技创新来改造,但现在还做不到。整个科学、科幻还在一个短暂空白的阶段。所以会让人更多感到对现实的迷惑。

这八年来的科技发展并没有给科幻小说带来新的技术上的灵感,实际上这是一个更加市场化、更加全球化、更加功利化的八年,大家沉不下心来。以房地产和外贸出口等其他的投资来带动经济的增长,整个中国变得非常浮躁。年轻一代忙于生存,也容易浮躁、急功近利。我觉得这是在耽误科幻。

写科幻的都是理想主义者

问: 大陆的科幻文学水平现在处在怎样的位置呢?

韩松:现在还是欧美和日本的科幻水平最强,华人作品在世界范围里属于中等偏上。有些作品的水平很不错,比如刘慈欣,是可以跟世界一流作者对话的。但我们整体还是差一些,主要还是作品太少,有的比较幼稚。另外,发行量分散到中国全部人口当中,就显得很少了。

问: 国内的科幻创作者都是什么样的人群?

韩松:学历都比较高,大都是大学毕业。而且理工科较多。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对仰望星空比较着迷。如果你有机会听到搞科幻的人在一起聊天是很有趣的,他们看起来很"白痴",聊的东西看上去跟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宇宙几万光年以外的事情,几千年以后机器人怎么发展。

对于现实的生活,他们却往往很低能。但很快他们会去另一个世界逃避开这一切。有人说科幻世界是一个逃避的文学, 这跟主流文学有很大的差异。主流文学搅到现实当中会走不出来,越痛苦越不知道该怎么办。

问:现在的主流文学也没有真正的讲到当下现实,大家还都是用以前乡村的记忆来写作。

韩松:对,有些真正现代化的东西他们都还没有触及。我觉得这刚好可以跟科幻互相补充一下。科幻要学习主流文学的长处,比如对人性的挖掘,科幻文学里面有些主题也是主流文学当中应该要吸取的。我觉得他们一些人的知识面还太窄,对

科技、对未来的感觉还不够, 这不是很好。

以我的看法,以后的小说都应该是把科学和文学融合在一起的。如果说小说是人性的,科学对人性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每一种人性都是在由科学创造出的物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今后所有的人性都会和科学有关,就像一个互联网就很容易会把人的关系改变。

问: 其实我的印象里,科幻小说还是非常注意探讨生存危机、人性弱点、道德困境这类问题的,跟现实联系十分紧密, 而不是一般人印象里的科幻就是漫无边际。

韩松:对,探讨的都是现代化当中最核心的问题。像刘慈欣写的《赡养上帝》,就是写在技术发展之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别,变成了两个物种之间的差别。再比如迟卉马上要出版的长篇小说,探讨了几代人两性关系的忠诚。它把人的忠诚植入基因,人从出生起,就注定生生世世要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像是订立了一份契约。这之间就存在了一种冲突,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在哪里。忠诚与自由,这是一个两难问题,结论可能是人会活得更加痛苦,这只有在科幻小说里才能探讨。

科幻小说不容易被大家接受,就是因为包上了科学的膜,变得有了门槛,一般人没办法一下子进入这个世界。他每天上班很累,只是想休闲、轻松一下,不如去看武侠,科幻还是太精英了。

另外一个是由于预置的概念,以为科幻是儿童文学,读科幻小说就是很幼稚的事。其实科幻小说在西方一开始就是一个 尖端。现代科幻小说起源于玛丽·雪莱,也就是诗人雪莱的妻子。她的小说《弗兰肯斯坦》讲的是人造人的故事,人能够向 上帝一样造物,而且被造出来的物种是要反叛的。他被剥夺了很多权利和自由,他想要一个跟他一样的女性伴侣,但都没办 法实现,最终他把他的造物主杀死。这里面带着弑父情结,有很多现代性的问题。

中国科幻的三重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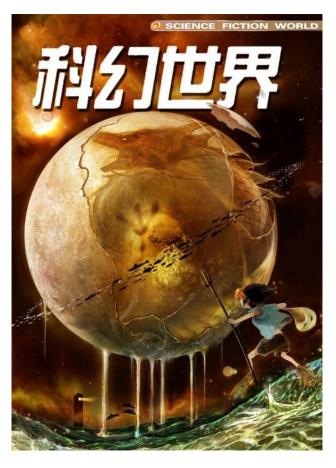
问:科幻小说在中国处于弱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韩松:科幻在中国没有文化基础,因为我们没有科学的 氛围。科幻本质上是一个关心未来的文学、需要想象力的文学,但在中国它就很没用,中国很现实,要么往后看,在历史中找答案,向权威要答案,要么希望马上得到娱乐的满足,像武侠。但科幻需要一种高智力的东西才能理解,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些科幻作品,在中国好多人都看不懂。比如《黑客帝国》的原版、在电影之前好多年的一个作品《神经浪游者》,这是非常著名的讲电脑空间的一部作品,奠定了科幻界整个的计算机基础。但当时在中国就没有人能看懂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所探讨的还没有达到它应有的水平,也就是写得还不够好。大部分科幻作品还只是意淫的小说,比较烂。这等水平的作品就是一种儿童文学,比郭敬明的青春文学还要差很多,人文关怀不够,文学性也不够。不管科幻小说写到什么地步,哪怕写一个星球也好,他还是要关注人的个体经验,但这些作者们并没有,他们还是太年轻。

没有科学文化的氛围,人们大脑里预置的观念,作品缺乏文学性和个体经验,这些原因共同造成了科幻文学的困境。

问: 所以科幻文学在中国实际上从来没有属于过大众文学?



韩松:可以这么说。它从一开始进入中国就带有精英的特色,一直到现在也是。比如它关注的是一些只有知识分子才能理解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社会的一些冲突问题。在中国唯一一个把它变成大众文学的就是倪匡的《卫斯理系列》,当然他只是带上了科幻的背景,有很多科幻的概念在里面,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幻。

问: 那你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是什么标准?

韩松:应该构筑在很强的科学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来展望未来世界,不能像哈利·波特。它设想一个东西要飞起来、一个世界要成立,必须有一个自然的东西给予支撑,而不是用魔法。另外科幻小说要极富想象力和传奇色彩。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没有做好。

问:中国人好像一直都是想象力缺乏?

韩松:也不能这样讲,像《西游记》、《镜花缘》、《封神演义》,多么丰富。但它们缺乏有根有据的科学基础。当然了,总体上,现代的中国人比较缺乏想象力。

问: 那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韩松:原因是这几十年或一百年,中国人已经陷入到一个非常焦虑、紧张的状态有关,忙于生存,有巨大的压力。封建 社会里还有一部分阶层,生活比较优越,这才能创造出李白这样的想象力。但现在整个中国都处在焦虑之中。

问: 不是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么?

韩松:这是对现实文学来说的。对科幻文学来说,太紧张了不太好。它也许必须在一个不那么紧张的情况下、有审美意境的环境下,才能写出像阿凡达那样的东西。不过,焦虑也在一定情况下能促进想象力,但那只是针对一小部分特异人群。

外星人怎么能降落到北京呢?

问: 你刚才讲到近几年科幻小说因为经济的发展变动更功利化、更浮躁,那欧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韩松:欧美在客观上也是有问题的。它的问题是发展高峰已经过去了,他们在五六十年代发展最好,这些年作者、读者都向高龄化发展,虽然也有一些好作品,但整个是一个滥俗的阶段。他们到中国来就能感觉到,下一个世界科幻的增长点应该是在中国。但欧美现在仍然有很多好的作品,水平还是超过中国,因为每年的产量很大。中国每年能出版的单行本科幻作品屈指可数。

问: 为什么说欧美科幻已经过了最高峰?

韩松:我觉得跟科学本身有关系。二十世纪到现在最大的科学发现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现在所有的技术的根源就是它们。核武器就此产生,造成了世界的危机,人们带着对新发明的恐惧要去探讨人类的未来。这之后,再一个大发明就是互联网的出现,人与虚拟空间结合,这又推动了科幻的发展。在往后就没有这样的力量了。

人类的几个新世界在过去都创造完了,一个是空间世界,一个是时间世界,一个是电脑虚拟空间的世界,一个是大脑本身的世界,这些作为题材已经被写得非常多了。第五个世界到现在都还没找到,于是进入了一个创作的平台期。这也影响到了国内的科幻创作,现在国内很多创作还是在模仿西方五、六十年代的创作主题,因为我们没有经历那样的阶段,看到后还会比较新奇。

包括中国形不成科学的氛围,也跟这个有关系。中国在科学上没有理论基础,没有类似于相对论、牛顿力学、量子力学

这样的创造发明,光靠激光汉字照排、袁隆平杂交水稻是不够的。你别笑,这两项还是目前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在过去三百年来中国独立发明创造的东西。中国真的要站起来,就是要靠科学,靠有一天发明一个理论,能超越西方。类似于如果互联网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才能真正的站起来。这也是我们的科幻作家们千方百计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在作品里写了太多这样的幻想,就是幻想有一天中国可以发明出这样的东西。

问: 现在的作品都在探讨中国强大的事情么?

韩松:以前的很多作品就在讲。像顾均正写的,中国强大之后要派出一批飞型器,把西方国家全给灭了。现在很多小说 也都是讲东西方文化的对峙,像刘慈欣的《球状闪电》,写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超新星纪元》讲东西方孩子之间的较量。 王晋康的好多小说也是写这个,中国强大之后怎么办。他们更多是表现出较量的意识,科学上要比西方强大,技术力量要比 西方高。

总体上来说这样的主题较多:在人家侵犯的时候要把人家战胜,或者说中国强大之后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当世界面临危机,中国人来拯救他们。年轻作者也写,他们会追溯到中国古代,建立强大的王朝,然后探索世界各地包括南极北极,这也是一种中国强大的表现。国家意识在这一批作家当中反映的还是很强的,是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

问: 科幻文学在刊登和出版上面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么?

韩松:有,很强。比主流文学还强。因为它写的是未来,如果写到未来中国不存在了,这就很麻烦了。一些关于未来跟西方国家发生战争的,就不能写成中国,要换成别的国家或者代号。日本有部著名的科幻作品是《日本沉没》,放在中国你肯定就不能写"中国沉没"。不过现在的尺度有点放宽,像潘海天写的《北京以外全部飞起》就通过了审查,是讲灾难来了,除了北京还在原地,中国其他城市全都飞到天上去了。

我以前出过的书,基本上每一本都不能顺利出版。有一本写外星人的书就出不了,因为编辑认为,外星人怎么能够降落在北京呢?还有写于九十年代末的《2066年之西行漫记》,,写美国成了二流国家,中国成了世界最强的。当时因为写到了美国世贸双塔被恐怖分子炸毁,只有中国挺过了经济危机,出版商就说不能写美国崩溃,所以当时无法出版。

另外就是涉及两性关系中一些过于大胆的内容。像赵海虹即将要出版的小说集当中有一篇就被删掉了,它里面写到人们 大量的克隆,甚至到最后整个乱伦,跟希腊神话很像,但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写得很真。这些其实是科幻文学的优势, 可以放在极端条件下探讨主流文学难以探讨的话题,出现这些出版控制,还是因为出版界对于科幻文学并不了解。

科幻的使命就是帮助现代化

问: 你觉得从现在来看, 科幻文学的发展趋势会是怎样的?

韩松:一个是文学可能会慢慢地接纳一部分科幻的东西,另一个是整体的科幻创作在会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又会上一个新台阶,这次上去了情况就会比较好了。其他的就很难预测了,因为这跟国家的发展趋势是有关系的,

问:这两三年,奇幻小说非常流行,你怎么看待它?

韩松:二者是可以融合的。他们总体都属于幻想文学,之间有很强的亲缘关系,奇幻作家跟科幻作家群体之间也比较亲密。但这两个领域的界限还是很分明的,就是作品中是否有科学技术。奇幻是不受科学技术限制,可以任意想象,所以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合作者。科幻的门槛还是高了一些,好多东西不读爱因斯坦就没办法写。

问:也许因为这样,大家印象里觉得奇幻文学就是青春文学,读者多是高中生、大学生。

韩松:奇幻也能发展出一种对现实的关注。像美国的奇幻作家尼尔·盖曼的作品《美国众神》,是相当震撼的。他写未来的美国社会,电视机电冰箱等物品都变成了神,美国原来从北欧、印第安、土著来的神还包括上帝,全都被推翻了。它对美国社会的问题揭示得很深,很好看。中国的奇幻就缺少这样的东西,现在很多就是到古代重新设定一个事件,然后就开始意淫。这还是跟作者太年轻有关。

问: 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是怎么看待科幻的呢?

韩松:他们好多都是反对科幻的,认为这是胡闹。真正研究科学的人基本有两种,其一是一些研究内容非常前沿的科学家,他们脑子里设想的东西,比如关于宇宙起源的解释、宇宙本质的理论,都比科幻还科幻;另一种是不愿意接受科幻,认为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定律,不愿意去想象,认为科幻是伪科学。王晋康的《生死平衡》提出过一个假设,认为人生病了,单纯靠抗生素去压制是不正确的,应该有另外的一种方法唤醒人体内的免疫系统,包括适度的向人体中注入病菌等。他提出的科幻设想,被方舟子、清华大学的赵南元等人强烈反对,在网上曾经展开了很大的争论,说他是伪科学。



问:这很有意思。一方面,科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严格用科学研究的标准去评价。

韩松:科幻的本质是解放想象力,不是科普,有时候他是故意要违反科学的。爱因斯坦认为光速是不可超越的,可是科 幻作家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制造可以超越光速的机器,事实上时间旅行正是科幻世界里最热门的题材;科学家发现火星上是没 有生命的,但科幻小说一直写火星上有火星人。《星球大战》中的一些现象是不能用物理学解释的,但大家都承认它是科幻, 它有自己独特的功用。

问: 那你认为科幻文学到底承担着怎样的社会使命?

韩松:这是多元的。一是有启迪教化、创造想象力的使命,使整个民族生机勃勃;二是娱乐休闲功能,一定要让大家觉得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创造一个公平自由的世界。科幻作者一般都主张限制权力,因为在科学定律面前,世界就应该是平等的。在宇宙众多物种中间,人类就是一颗沙子,人类、外星人、机械人,无非是宇宙大爆炸产生的粒子,他们都是平等的,都应该是自由的。在这方面,我有时觉得写科幻其实跟八十年代崔健他们搞摇滚很接近。

问: 具体到中国的使命呢?

韩松:就是现代化。从鲁迅就开始了,提升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为中国人扫盲、解放他们的思想,这就是科幻在中国的使命。多一个人看科幻小说,他就会接收到这样一种观点。现在不是一直在改变么?

图 1 为 2010 年韩松在北大做科幻讲座

图 4 为 2009 年 2 月《科幻世界》封面,获得国内科幻最高奖"银河奖"之最佳科幻美术作品奖

TRANSLATION 译介

监狱知识分子

作者: 保罗·伯曼

译者:吴万伟(武汉, <u>wuwanweione@yahoo.com.cn</u>)

I.

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中午的黑暗》开头几页读起来令人恐怖。作者用了几句话的篇幅把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神秘的宏大的哲学主题之一揽入怀中,用他娴熟的诗歌技巧把他的宏大主题简化浓缩成几个简单的形象:

车门在罗贝修福身后呯的一声关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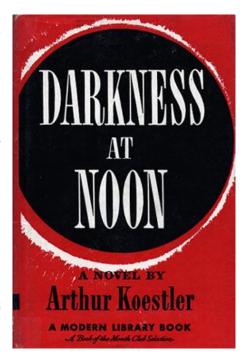
他仍然靠着墙呆了几秒钟,点上香烟。在他右手边的床上有两个比较干净的毯子,稻草床垫看起来是新铺的。左手边的 洗脸池有塞子,不过水龙头还管用。水池旁边的盒子刚刚消过毒,并没有发出难闻的气味。两边的墙壁都是坚硬的砖头,可 吸收水龙头的声音,在暖气和排水管穿透的地方,被灰泥抹得非常好,能够发出回声。而且,暖气管本身似乎能传递噪音。 窗户就在眼睛平视的高度。罗贝修福抬眼透过窗户栅栏向外观看:白雪、明月、银河、正步走的哨兵、电灯的黄色光线。

你记得罗贝修福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坚定战士。从前作为高级党代表,为了苏联的利益,他总要求世界各地的党员干部执行共产党的纪律。如今自己的同志指控罗贝修福犯下各种荒谬的罪行,并把他押上法庭审判,虽然他真正的罪行是对我们所知的斯大林这个一号人物的不满,拥有一些谨慎的、有道理的保留意见而已。凯斯特勒描述罗贝修福最终屈服。在监狱被审讯的过程中,出于对党的纪律和信仰的忠诚,他应该承认针对他的每一项荒谬指控,应该公开忏悔。他应该欢迎我们都知道

的不可避免的处决,正如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其他早期布尔什维克领袖在 1930 年代后期在莫斯科审判时遭遇的一样,令全世界震惊。凯斯特勒用经典的简洁笔法描述了整个神秘事件的发展过程。罗贝修福被准时枪决,他临终前的一些思想反映了他的困惑,自己究竟是被斯大林还是被希特勒下令处决的。

但是本书开头的形象贯穿始终。凯斯特勒不断回顾这个情景,每次都有些许变化。在小说的第 200 页前后,罗贝修福来到监狱中用来锻炼身体的院子,地上覆盖着雪,天色阴沉,小鸟在机关枪塔楼上空飞翔。考虑到死囚区的情景,《中午的黑暗》的这些简单的形象不仅令人恐怖,让人觉得奇怪的是竟然看起来很美。这种美连绵不断,有很多话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比 1940 年还多。凯斯特勒最终完成了初稿,安排人从维希政权时代的法国偷送到英国,并在第二年出版。

迈克尔·斯卡梅尔(Michael Scammell)写的精彩传记告诉我们凯斯特勒读过海明威的作品,这太正常不过了。凯斯特勒作为年轻的记者前往报道西班牙内战,表面上看,他是英国报纸独立的自由派记者,实际上在那时候他已经是正式的共产党员,秘密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海明威也去了西班牙,并根据这个经历写了小说是《丧钟为谁而鸣》,这是他自己对 20 世纪专制主义的思考和斗争策略。该书 1940 年出版,凯斯特勒的小说本来也应该是这种模式。



海明威小说中坚定不移的战士是左翼美国军队志愿者罗伯特·约旦(Robert Jordan),他来到西班牙加入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和凯斯特勒的罗贝修福不同,在本书的开头几行,罗伯特·约旦看到了残酷的场景,那是一片松树林,沥青路,阳光下闪着白光的瀑布,看到的每个物体都有军事用途。但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我们马上认识到描述这些细节的叙述者的声音:一个忠诚的美国人受到破碎的心和时代悲剧的折磨而变得说话异常简短精炼,是对自己能摆脱多愁善感而感到自豪的多愁善

感者。结果,这个寡言者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1940年的海明威似乎没有注意到他自己时代的巨大复杂性,这使得本书在当今时代难以卒读,实际上还令人尴尬。虽然如此,《丧钟为谁而鸣》的声音,它对西班牙的愚蠢的感情正如海明威小说中总是具有的特征一样确实还有一些魅力。

但是《中午的黑暗》开头几行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一点都不清楚,肯定不是凯斯特勒本人的声音。他是匈牙利犹太人,小时候在家里说德语,在学校说匈牙利语。到了写作《中午的黑暗》时,他已经在布达佩斯、维也纳、柏林、巴勒斯坦(他坚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修正派,虽然他的伟大成就是发明了希伯来语的猜字谜)、俄国(放弃犹太复国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西班牙(主要经历是在法西斯几个监狱服刑,等待随时可能的处决)、法国(在巴黎担任记者,然后再次被关进监狱,这次是维希政府的集中营,他在这里为《中午的黑暗》做了很多准备)呆过很长时间。他也采取了几个临时性措施朝着未来的英语作家的职业生涯迈进。他在西班牙监狱里学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

什么样的文学人物——那些奢侈的、精通多种语言的、拥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经历的人加起来构成书中可以听得见声音的人物性格呢?某种巴洛克式的中欧国际主义者,当然。或者后来成为一个具有一直延伸到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泛欧洲身份认同的人。不管怎样,众多的经历加起来构成对各种多愁善感极端厌恶反感的特征。这些使得他偏爱抽象思维和偶尔沉溺于形而上学幻想中。

斯卡迈尔引用了凯斯特勒 1952 年的自传《空中飞箭》的开头一段。其中,凯斯特勒解释了他总是对"命运语言"感到着迷。他写到,"星相学是建立在人是由空间环境形成的信念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我相信这两个说法都是真实的。"星相学马克思主义或许成为走的太远的意识形态多元化。但是显然,凯斯特勒就是这样想的:坚信命中注定的事物,极端的决定论。这是《中午的黑暗》开头几句话的意思。稻草床垫、洗脸池、厕所、排水管——这些都是人类最基本需要的迹象和现实。低俗的马克思主义。透过装有栅栏的窗户往外看,银河和月亮是最高贵的宇宙命运的迹象。物质和星空。让人感到震惊的星相学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语言"结果成为凯斯特勒小说的风景。

《中午的黑暗》的整个剧本包括在凯斯特勒的英雄尽最大努力地与命运的星相和物质力量做斗争。这种斗争在开头几句就已经开始。到了第六句,罗贝修福已经明白,他可以通过敲打水管与其他囚犯交流,像囚犯的"二次函数符号系统",无论住在隔壁牢房里的人是谁。我们认识到罗贝修福的战场将是巨大的和算计好的,真正英雄的斗争具有敏锐的智慧、高超的适应性、以及依靠自己的惊人力量。而且,在第一页结束前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凯斯特勒已经创作了普通心理小说或社会小说或政治小说所没有的东西。他讲了普罗米修斯神话——个具有反抗能力和无尽意志的男子汉的故事,他将与绝对命运的宇宙和非宇宙力量进行大无畏地斗争。

II.

1930 年代一群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热心于普罗米修斯神话,冲动的核心是美国。在那里,这群人把共产主义运动放在普罗米修斯及其斗争的背景下描述。埃德蒙顿·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代表作《到芬兰车站》就是围绕普罗米修斯展开的。顺便说一下,这本书也是在1940 年出版的。威尔逊的书提出了过去几个世纪社会科学观点的历史,能够发现和优化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和后来的观点,即通过强有力地干预历史事件,那些认识到这些规律的英雄和哲学领袖可能运用这些规律。哲学上能干的领袖能够把人类推向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

威尔逊通过回顾 17 世纪和维柯(Vico)开始他的历史,然后他开始跳跃性地奔向马克思。在威尔逊看来,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发现证明是关键的,马克思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本人就是普罗米修斯,是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为了人类的利益,最终为人类盗取了火的秘密。但是,正如威尔逊看到的,即使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突破也包含着缺陷,可能导致不善于思考的马克思主义者落入陷入宿命论的陷阱,因此需要再一次的普罗米修斯反抗。这次反抗是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更倾向于行动和意志。威尔逊显示列宁在马克思发现的基础上是如何领导这种反抗的。这种反抗让被动的社会民主充满力量,变成超级激进的布尔什维克行动和意志。列宁 1917 年乘火车来到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后,经过自己改进把马克思的发现应用在革命实践中。在这个模式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发动了威尔逊开始写这本书时依依不舍仍然怀抱着的人类最后解放的希望。

到了威尔逊完成手稿的时候,他已经非常清楚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他把这种失败归咎于马克思 19世纪的哲学错误。马克思曾经欠考虑地从黑格尔那里吸收了一丝神秘主义色彩。神秘氛围把马克思的运动从清醒地追求进 步的社会科学行动转变成宗教性的陶醉。宗教性狂迷产生妄自尊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妄自尊大导致了独裁,导 致了罪恶,故意把道德考虑抛到一边,最后导致了人道主义的非人化。



这就是威尔逊在《到芬兰车站》中提出的论点。这就是转变成悲剧的普罗米修斯神话:反抗和反反抗的故事。自由及自由的背叛,攻击和自我牺牲,火与自我献身。威尔逊的哲学导师是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和悉尼·胡克(Sidney Hook)。在同一年,这些厉害的思想家每人都提出了同一种解释的不同版本。伊斯特曼在《读者文摘》的文章中(后来收录在他《反思社会主义的失败》中),胡克在《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中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1940年在美国,悲剧性的普罗米修斯主义不仅是论点,而且是一种思想流派。

在某种程度上,凯斯特勒在美国同事难以经历的欧洲情景下构思的小说得出了大致相同的解释。只不过,不是把他的解释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呈现出来(比如威尔逊)或者作为对话体的哲学(如胡克)或者大众杂志说明文(伊斯特曼),凯斯特勒用小说对话的形式体现了出来。罗贝修福还是党代表的时候的任务使得他在纳粹专制初期来到

德国。在那里,罗贝修福秘密会见了遭到毁灭如今转入地下的德国共产党的幸存者和同情者。那些侥幸活下来的战士和无私 的英雄一直在散发传单,在墙上贴标语。但是共产党向罗贝修福解释,他最好散发自己论证严密的传单而不是党的领袖下发 的自暴自弃的蠢传单。

在纪律严明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级干部都不应该对领袖表示怀疑。罗贝修福告诉自己"党永远不会犯错误",因此有神秘的永不犯错原则。罗贝修福说"党是历史上革命思想的体现者。"而且,"对历史没有绝对信仰的人不配做党员。"在吟诵了这些教条后,罗贝修福庄严地驱逐了错误的德国同志。罗贝修福非常清楚这个可怜的人很快将成为纳粹的抓捕对象。这不仅是政治上的残酷行为,而且是道德上的罪恶。

这正是威尔逊、伊斯特曼、胡克在 1940 年代的作品中用自己的方式辨认出的那种恐怖——被剥夺了道德考虑后变得丑陋的普罗米修斯英雄主义,更不要提反作用了。凯斯特勒只是在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思想家,那就是对罗贝修福的描述。美国作家刻画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后代的历史,就好像整个故事被卡尔·马克思这样受到大学教育在利物浦图书馆里钻研文件的的哲学家所主宰。这种人的生活中最糟糕最具破坏力的错误是学了太多的黑格尔而不是康德。这是胡克对马克思的解释:马克思是个被德国哲学传统的模糊性毁掉了的杰出思想家。

但是,凯斯特勒通过《中午的黑暗》的第二句向我们显示另外一些特别重要的东西。罗贝修福是正宗的知识分子,但他 接受的教育远远超过了你能在图书馆学到的东西。通过敲打牢房墙壁和水管,检查装有栅栏的窗户找到与其他囚犯交流的方 式,被抓进监狱后的这些即刻反应来自独特的次文化。罗贝修福对这种次文化的掌握和精明给悲剧性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增加 了额外的小扭曲,这些是凯斯特勒的美国同行的作品中所没有的。

迈克尔·斯卡梅尔告诉我们,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长大的凯斯特勒阅读了很多作家的作品,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是詹姆斯·芬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现在连孩子都不再读他的作品了。库柏为文学世界引进了一流的神秘原型:皮袜子(美国开拓者)。皮袜子是一种超人,他掌握了森林秘密和莫希干人幸存者的智慧。这给予他一般白人都不可能具备的高度警惕性和大无畏的创造力。皮袜子非常勇猛,是出现在世界文学中的第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物。

我们不认为库柏对文学或思想的历史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但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提出不同观点。巴尔扎克喜欢库柏,他引用了皮袜子,让精明的读者认识到森林的迹象,并把他移植到巴黎社会生活的丛林中。然后,巴尔扎克又进一步,在他塑造的人物伏脱冷(Vautrin)身上增加了库柏发明的另一变化,即把牢房英雄变成了犯罪团伙的冷酷老板。他隐藏的智

慧不是来自蛮荒之地的莫希干人甚至不是来自巴黎沙龙里的世故,而是来自监狱。这里产生了新的文学原型人物,邪恶的新 类别:巴尔扎克的伏脱冷,罪犯操纵者。

只需要俄国人把这个思想转变成最终的版本——皮袜子那样的超人,因为多年的牢狱生活而变得冷酷和狡诈,因为监狱文化的神秘智慧而更加精明,因为彻底和高墙外的社会和世界脱离关系而成为另外的物种。现在只不过不是作为拓荒者而是作为犯罪团伙的头目遭遇牢房外的世界。他成为有教养的思想深刻的知识分子,充满了对正义和未来更美好世界的强烈渴望,即革命左派。伏脱冷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是携带有详细论证过的社会进步方案的囚犯,同时具有敏感和冷酷两种性格。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是左派乌托邦小说,严格来说是傅立叶主义者的作品,但它也是监狱小说,赞颂了颠覆性的革命超人概念。涅恰耶夫(Nechayev)的《一个革命者的教义问答》也像监狱作品,是连接到沙皇监狱墙壁上的文学后果。

形形色色的监狱作品成为俄罗斯文学的支柱之一,也是世界文明的支柱之一。俄国文学甚至还产生了美国后代,美国文学的次要经典(或许我可以说具有重要的甚至凯斯特勒的遗产)如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监狱回忆录》。这是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出版社 1912 年出版的书。伯克曼是移民美国的俄罗斯犹太人,1892年曾出于俄罗斯革命思想试图暗杀钢铁大王享利·克雷·弗利克(Henry Clay Frick)。这使得伯克曼在此后的 14 年里一直被关在匹兹堡附近的监狱里。

伯克曼对监狱生活的描述充满了宾夕法尼亚细节,但该书也引人注目地赞美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俄罗斯传统随处可见。 为了大写的事业愿意自我牺牲的传统刺激人们消除人类情感,吸收监狱囚犯的规范和团结。当然,伯克曼希望像他自己这样 经历监狱考验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运动不断壮大和繁荣。监狱将产生像他自己这样的钢铁巨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涅恰耶 夫和其他俄国作家塑造的理想人物都是那种无政府主义者,带来革命的人物。他们有清醒认识社会的知识分子的骄傲,在特 定情形下也是从监狱中锻炼出来的强人。

在他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监狱回忆录》中,伯克曼写到:

还有什么比为一个伟大、高尚的事业而献身更高贵的事业呢?啊,真正的革命者的生活中除了为他热爱的人民做出牺牲没有别的目的,没有别的意义。还有什么比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更伟大的事呢?除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外,一个既没有个人利益也没有个人欲望的人,一个从凡人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人。他已经超越了凡人的需要,达到了排除所有怀疑和所有遗憾的信仰高度,简而言之,他是一个从内心深处在各方面都把革命者放在优先于人性地位的人。

当然,正如伯克曼希望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运动确实繁荣了一段时间。它产生了一些英雄人物和一流的文学作品,如克鲁泡特金的《革命者回忆录:克鲁泡特金》和《在俄国和法国的监狱里》。他是一个讲究人道的,科学素养很高的人,文笔优美,政治观点深刻,虽然他的主张并不总是指向实用方向。不过,最熟练地抓住监狱左派精神的政治运动不是克鲁泡特金的运动,而是具有怪异俄国变体的马克思主义。那是建立在具有钢铁般意志,毫不在乎自己的幸福生活甚至生命的革命者理想基础上的强调行动和意志的马克思主义,只要服务于忠诚的革命事业,他们可以把法律和道德考虑一概抛诸脑后。这些崇拜像伯克曼这样的钢铁战士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自己看作已经死亡或者将近死亡的人,因此能够做出不同寻常的行动。这是一种用监狱文化带动的马克思主义,是威尔逊、胡克、伊斯特曼倾向于忽略或者故意轻描淡写的思想史的一些细节,虽然这些美国观察家很聪明。

抓住马克思主义并把它转变为怪异罪恶的错乱源头是沙皇监狱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德国哲学传统的模糊性。它是从彼得保罗要塞流出来的污水,是德国哲学和沙皇监狱文化的不协调的混合体。用巴枯宁的话就是"皮鞭日耳曼人",用伯克曼的话是需要做出"革命第一生命第二"的决定,一个让自己成为某个事业的狂热者的决定,不仅仅是严格的教条主义者或者无情的战士,而且是把生命置之度外的超人。简单地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错乱是这种人开展的政治运动,他们成立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党,当然也不像卡尔·马克思自己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相反,那是一种人肉坦克旅,一句话,是布尔什维克主义。

III.

这是凯斯特勒在《中午的黑暗》第一句中抓住的东西——把革命激情和监狱文化结合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混合体,一起与命运的无情力量抗争。开头段落读起来激动人心是因为凯斯特勒用几个形象刻画出命运的力量,19 世纪和 20 世纪思想家所能创造出来的与命运做斗争的最伟大力量: 刚强的监狱知识分子,他们因为对被压迫者的深刻同情而充满力量,因为接受过哲学训练而具有深刻的分析洞察力,因为监狱囚犯神秘知识的砥砺而成为具有钢铁意志的人,一个既是生者又是死者的人。

他们是监狱文化的捍卫者。

但是,为什么凯斯特勒的罗贝修福坦承认荒唐的罪行呢?进一步延伸,为什么像布哈林这样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审判的法庭上忏悔呢?凯斯特勒向我们显示了罗贝修福思想意识的另一面以及他与审讯者你来我往的辩论。这些审讯者不可避免地引导他得出按要求进行忏悔是最好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中午的黑暗》是思想小说,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在是完全成功的。

1947 年,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写了一本名叫《人道主义与恐怖》的书,就是要

显示或试图显示凯斯特勒光欣赏马克思主义是不够的,还应该认真考虑历史规律没有发挥作用的事实。总的来说,正如梅洛·庞蒂看到的,凯斯特勒没有能承认斯大林论证的思想力量。梅洛·庞蒂对苏联现实的无知使得他的指责在今天看起来值得同情。但是 10 年后,厌恶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对苏联有些了解的欧文·豪(Irving Howe)在《政治和小说》中再次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从豪的观点来看,凯斯特勒对马克思主义者推理的描述缺乏托洛茨基在《背叛了革命》中分析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政策时表现出来的细腻,里面不仅有哲学真理和错误的分析而且有对社会力量的分析。

豪的批评在今天看来好像缺乏同情。凯斯特勒在用异常简单的方式展现大问题时表现出惊人的才华,但他并不总是有兴趣对稍微复杂些的东西进行论述。他撰写文章武断地谈论政治目的和手段,这些文章都倾向于过分简单了,像麦克斯·伊斯特曼的文章一样目标针对的是读者大众,没有试图达到伊斯特曼的深刻和老练。凯斯特勒的1940年代唯一最著名的文章"瑜伽修行者和党代表"发表在1942年英格兰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的《地平线》杂志上,总体上是挑



衅性的自相矛盾的陈词滥调,并没有发人深思之处。凯斯特勒认为,为了实现社会进步,我们需要政治人表现出瑜伽修行者的品质——圣洁、非暴力、关心内在灵魂,但同时也要表现出党代表的品质——在所有人身上无情推行社会改革的意志,必要的时不惜使用武力。这两种政治永远不可能结合。这是有些意义的观点,但康诺利说得更透彻。

凯斯特勒在 1940 年代撰写过苏联议题的文章,这是任何试图定义苏联社会本质,试图解释俄国革命的人都会写的东西。 我觉得他的苏联话题文章是值得尊敬的,但几十年后再读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价值。在这些文章中,凯斯特勒甚至试图提出与 《中午的黑暗》观点相反的观点。他在共产主义的大错误的文章中说,错误不是把宗教品质纳入进来而是没有纳入宗教品质。

所以欧文·豪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很大(豪本人多年后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政治与小说》修订版的序言中评论说,他自己"摇晃的成见"来自他的'社会主义青年和反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经历)。因为即使罗贝修福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凯斯特勒呈现的)缺乏托洛茨基的细腻,这个表现已经很好了,足以说服我们相信罗贝修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认真地反复地思考历史规律和无产阶级命运的人。凯斯特勒对罗贝修福稍纵即逝的反思的刻画非常好,足以向我们显示虽然罗贝修福崇拜布尔什维克的非人性,但他具有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党性与道德的紧张关系的本能。《中午的黑暗》真正狂野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他地方,这就是凯斯特勒告诉我们的罗贝修福这个人而不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特征。那么,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回首 1947 年当梅洛庞蒂出版他顺便对《中午的黑暗》的评论时,在 1957 年当豪出版他的反同路人观察时,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两者都没有考虑小说的风景。但在没有什么比一部以"牢房的门在罗贝修福身后呯得一声关上了" 这样的句子开头的小说更能显示风景的重要性了。凯斯特勒从一开始就想告诉读者,就像在新大陆拓荒的皮袜子,罗贝修福是在牢房和铁窗中才感到自在的人,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精明能干、公而忘私、决不相信命运的人。如果罗贝修福是监狱中人,他所做的任何事就都容易理解了,即使我们不考虑与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俄国革命的理论。一个愿意受苦,愿意为他人利益忍受可怕痛苦的人,一个崇尚自我牺牲,绝对忠诚他人的人,这就是监狱文化本身。

我敢肯定,美国现有的监狱包含犯罪团伙成员或者黑社会成员,他们能够赢得法院一丝同情或者甚至能逃出去,如果他们脱口说出团伙成员或者老板的真实道白。但是这些人并不因为破坏他人生活而遭受良心的谴责,也不后悔毁掉了自己的生活。他们能继续表现的就是对自己珍视的原则的持久忠诚,对团伙及其头目的无限忠诚。监狱文化与黑帮文化在这点上是重

叠的。那么,罗贝修福这个人是谁?一个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读过很多书熟悉历史哲学的人。但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也是个囚犯,一个了解监狱行话,展现囚犯坚强不屈的性格的人,愿意为了地下党其他同志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这里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凯斯特勒的特别创新之处,他对将近一个世纪的俄国文学以及受俄国影响的左翼监狱文学的杰出贡献是向我们展现了经典的革命囚犯。不是 19 世纪俄国的囚犯——沙皇的笨蛋或者监狱长,而是愿意逐条与囚犯辩论谁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更真实更真诚的左翼革命者。审讯者甚至被认为是这个事业的更优秀的代表,他们更优秀是因为来自低层阶级,而罗贝修福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一个在艺术博物馆举行秘密革命会议的人。梅洛庞蒂抓住了凯斯特勒小说人物的不同阶级出身,作为证据显示罗贝修福实际上是反革命,而现实生活中的斯大林主义者在领导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并不完美。

但是,如果你接受从前 19 世纪知识分子的英雄观念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作为既定的概念,如果你接受这个英雄概念的俄国监狱变体,那么罗贝修福这个受到良好教育囚禁在牢房里的智慧之人就成为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的英雄。他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拉赫梅托夫(Rakhmetov),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监狱回忆录》中的克鲁泡特金,是涅恰耶夫的《一个革命者的教义问答》的理想革命者,也是《监狱回忆录》中的伯克曼。问题不在于罗贝修福的具体政治立场正确与否,而在于内在个性。他是普罗米修斯的理想,从沙皇的地牢中爬出来的受苦者形象。在写出"牢房门在罗贝修福身后呯得一声关上了"后,凯斯特勒让读者遭遇了确切无疑的大难题。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欧洲文学和文化尤其是在左翼领域的任何一个思想高尚的传统都指导我们崇拜罗贝修福,敬重他绝不屈服的顽强和对事业的忠诚,即使凯斯特勒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党在一号人物领导下如何严重地破坏了这个事业。但是,在我们敬佩罗贝修福的同时,我们也想谴责把他毁灭的共产主义体制。我们将不得不认识到反沙皇革命运动的伟大英雄结果却被囚禁在布尔什维克的反沙皇监狱中。导致我们崇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19 世纪普罗米修斯英雄崇拜的逻辑犹豫不决地带领我们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越是欣赏革命的美德,我们诅咒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愿望就越强烈。没有办法逃出这个两难困境。苏联的监狱生活故事不可能导致其他的可能性,苏联监狱生活的故事不可避免。

这绝不是凯斯特勒的微小洞察力,这是问题的关键。早在 1940 年代,他的读者,至少一部分读者在书刚一出版就已经认识到其重要性(虽然正如斯卡梅尔告诉我们的,这本书在不同国家出版的时间不同,被读者接受度也不同。在英国静悄悄的没有多少热情;在美国引起轰动,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在法国因为纳粹占领和战争而推迟出版,出版后产生巨大的热情并带来重大政治后果;在德国推迟到战争后出版,因为英国担心激怒苏联;在匈牙利在 1980 年代以手抄本形式出版)但是凯斯特勒的成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发明显。在《中午的黑暗》出版几十年后在共产主义的祖国摧毁共产主义运动的批评和揭露到底是什么?曾经是文学和思想高尚的知识分子的世界的共产主义怎么了?



IV.

我要通过回顾亚历山 大·伯克曼和他在1906年从 匹兹堡监狱释放以后的命运 提出一个答案。伯克曼是犹太 人工会组织"工人圈"(the Workmen's Circle)的组织 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和意第绪 兄弟会成员。他写了监狱回忆 录。按照历史学家保罗·阿维 里奇(Paul Avrich)的说法, 他或许仍然保持着暴力反抗 资本主义的阴谋。考虑到他的 兄弟会组织和自传式文笔,他 在旧金山出版了不是非常反 暴力的言辞激烈的无政府主 义杂志《风暴》(The Blast),这很容易令人相信。在 1919 年的最后几天,伯克曼被驱逐出美国,连同埃玛·戈德曼和几百个 无政府主义者好战分子和美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成员一起来到刚刚革命的俄罗斯。他在俄国得到英雄般的欢迎,因为他 在遥远的资本主义美国居留期间,严格按照传统的俄国革命理想指导下生活。

俄国革命已经转向布尔什维克方向。布尔什维克政府即将两岁,当时还没有成功地摧毁其他左翼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左派社会革命者、右派社会革命者、犹太社会主义者等等,其中有些人在苏联的不同角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但列宁已经下令大肆枪杀和逮捕他们了。左翼政党开始抗议,他们把革命的名声带进自己的抗议活动中。克鲁泡特金这时已经上了年纪,处于晚年阶段,但他在俄国人的心目中地位仍然是崇高的。在沙皇被推翻后,他从流放地返回时六万人出来迎接他。他最后的政治活动是撰写了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广泛批评,私下里送给列宁,后来还公开发表:严厉地谴责布尔什维克,确立了革命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并提出了真诚的建议。如果列宁想创造苏联的光明未来,就应该鼓励自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而不是中央集权的暴政。克鲁泡特金甚至建议列宁模仿美国的一些美德,不要继续像列宁那样假设美国的财富和力量不过是帝国主义者暴力掠夺的结果,这清楚地显示在克鲁泡特金的晚年,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已经倾向于自由主义。

从 1921 年克鲁泡特金去世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他在莫斯科的葬礼是苏联发生的最后一个合法的反布尔什维克群众性政治运动。亚历山大·伯克曼在无政府主义哲学问题上是克鲁泡特金的追随者,考虑到他的地位,他在组织葬礼活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也向列宁提出了抗议。随着苏联发展方向的逐步清晰,亚历山大·伯克曼逃往柏林,后来到法国。他返回到沙皇时代极端左派的传统活动之一,就是动员左翼力量支持俄国被囚禁的革命家,俄国监狱和集中营的受害者。只有这时被处决和抓起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的受害者而不是沙皇的受害者。亚历山大·伯克曼成立了一个资助囚犯的组织"俄罗斯援助基金"。该机构给受到迫害的同志送包裹,试图记录他们的情形,向世界公布他们的命运,但关注的人并不很多。虽然如此,亚历山大·伯克曼在世界各地都有崇拜者。

伯克曼 1936 年去世,因为身体状况太差而自杀。他的一些同志继续从事他的事业,其中最有劲头的一个人是莫斯科克鲁 泡特金葬礼委员会年轻的成员,名叫马斯莫夫(G.P. Maximoff)——这个人曾经在 1917 年最初的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帮助创办了无政府主义者报纸。因为反对新的专制,最后他自己也被关进监狱。马斯莫夫逃往柏林,后来到芝加哥,靠办墙报谋生。在有空的时候,继续从事文件收集整理工作,用系统的方式编辑调查,最终出版了长达 624 页的书。马斯莫夫把他的书称为《绞刑架在工作:俄罗斯恐怖的 20 年》(数据与文件)。该书出版于 1940 年,正好是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胡克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以及伊斯特曼的《读者文摘》文章发表的同一年。也是凯斯特勒完成《中午的黑暗》的同一年。

马斯莫夫在出版自己著作时处于相对的劣势。从他的芝加哥蓝领工人难民之家,他知道如何呼吁美国劳工运动中坚定的 左翼反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但这些人往往也是移民、流放者或像他一样的普通工人。他不知道如何接触到美国和其他地方的 主流媒体的记者和知识分子。或者,作为崇尚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马斯莫夫并不急于与他人接触。所以他不寻常的书是被 自己的盟友被称为伯克曼基金会芝加哥分会的小委员会出版的。该组织的支持主要来自伯克曼从前的兄弟会"工人圈"、"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这里无政府主义者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和美国分散的俄国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群体。

我认为在美国劳工运动的几个角落,马斯莫夫的厚书可能发挥了作用,是促成了"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以及美国 劳工联合会中某些人的反专制理想主义的另一个因素。我并不清楚他的书是否引起了大众报刊或者主流知识分子的兴趣。该 书前半部分在最近一些年一直被众多无政府主义组织重新印刷,但自从巴枯宁或者克鲁泡特金的学生在美国劳工运动内发挥 哪怕最轻微的影响力的时候起,已经过去了几代人了。马斯莫夫著作的下半部分包括了关键的文件,除了少数图书馆和个别 旧书商那里以外如今完全无法搞到。《新共和》的读者中有少数人听说过这本书,我会感到吃惊。

既便如此,在我已经讨论过的 1940 年以来的众多著作中,马斯莫夫的《绞刑架在工作》可能是从感情上说最强大,从思想上说最有有说服力,从道德上说,最可怕的。该书把列宁描述为进行最大规模的屠杀和恐怖压迫的魔鬼。该书记录了一些画面。该书以年为单位回顾了列宁政策的几个阶段,从 1918 年 4 月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被镇压开始。该书解释了列宁政策的群众性后果,早在 1921 年就出现的政治运动造成的饥荒。该书回顾了苏联任何形式的政治自由逐渐遭到破坏的过程,提出了一些统计学证据。

在马斯莫夫的分析中,"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实验除了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破坏和灾难外,还使得一千万到一千两百万人失掉生命,"虽然他认为他的数字是低估了的。该书还做出了文化判断,"俄国文学,从来没有向任何专制低头的,代表最高道德水平的大胆、反抗、启蒙的俄罗斯文学,现在成了充满恐惧的,把人民变成奴隶和阉人的工具,""拥有文学那样的地位的艺

术和音乐不得不屈服于占据高位的傻蛋。"因此,现在没有一个看起来愚蠢或者过分。

但是《绞刑架在工作》最令人恐怖的方面在于第二部分,也就是最后的三百页。那里面记录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命运。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犯下的错误是在俄国革命早期与布尔什维克人合作,这个错误马斯莫夫似乎从来没有充分认识到。接着,正如马斯莫夫显示的,在列宁巩固了权力后,布尔什维克人开始系统地毁灭从前的盟友。马斯莫夫记录了每一个事件,有时候引用苏联官方出版物,有时候是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宣言或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报纸的片段,还有最令人胆寒的是很多人的走私信件和个人证言。

看不见的书写

章节的标题和副标题讲述了故事:"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的处决","革命者在哈尔科夫(Kharkov)被枪决","大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处决","一封来自里亚赞(Riazan)监狱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信","塔甘卡(Taganka)监狱的上诉"(其中很多人宣称他们几乎饿死),"4号牢房绝食抗议"。一个针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宣言解释说"来自俄国的最新消息让我们深感忧虑:布尔什维克决定杀掉监狱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国际主义者的绝食抗议","把所有政治犯都转移到索洛韦茨基群岛","两位同志消失","索洛韦茨基修道院"("索洛韦茨基修道院对囚犯的持续的残酷虐待难以用语言描述,这个非人之地的囚犯稍微违反规则就被痛打一顿,被迫脱去衣服在气温低于零度的时候赤身裸体站在黑暗的牢房里。现在两个囚犯科列斯耶夫(Klysiev)和扎普钦(Zapechin)就躺在那里,手和脚已经被冻掉了正等待死亡,这是他们结束痛苦的唯一解脱。")"驱使政治犯自杀"("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政治禁闭室的条件可以被更好地想象而不是描述,政治孤立者,农民无政府主义者格里戈尔耶夫(Grigoryev)试图自杀而被活活烧死")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姓名清单,有时候还有照片,同时有关该同志特征的描述:"在勒夫托夫(Lefortov)监狱" "很可能死了","在西伯利亚乌拉尔斯克(Uralsk)区奥多斯克(Obdorsk)流放","流放到西伯利亚纳里木(Narim)区","处于完全孤立中",更不要提伤寒和毒打等。

300 页这样的东西占很大的篇幅,即使除了前面几百页有关列宁目标和思想风格的话题。马斯莫夫的信息确实可以理解。你认识到你在阅读由一个疯子和他的追随者在做的毁灭群众运动的纪录片历史。毁灭运动正好包括在 **19** 世纪起来反抗沙皇的那些人,那些经受监狱洗礼的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对事业的忠诚胜于珍视自己的生命。

你也许认识到了,阅读马斯莫夫的《绞刑架在工作》好像是在阅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初稿。索尔仁尼琴知道马斯莫夫的伟大著作吗?索尔仁尼琴肯定了解一些被抓起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他的小说里,他用同情的笔调描述了在西伯利亚流放的命运的克鲁泡特金的同情者,但他似乎根本不知道马斯莫夫。迈克尔·斯卡梅尔是索尔仁尼琴和凯斯特勒的传记作者,虽然他的索尔仁尼琴传记篇幅很大(凯斯特勒的传记也一样),马斯莫夫的名字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不管怎样,很难想象索尔仁尼琴怎么能阅读到马斯莫夫的厚书。马斯莫夫用俄语写作,但亚历山大·伯克曼基金会芝加哥分会出版的是英译本。

不用说,《绞刑架在工作》缺乏《古拉格群岛》的修辞力量。既便如此,马斯莫夫也是具有文学天赋的人。在读他的书时,你已经开始瞥见几十年后索尔仁尼琴著作所能掀起的巨大能量。这里,从思想上说,1940年的《绞刑架在工作》已经是彻底毁灭,亚历山大·伯克曼在他的"布尔什维克神话"的小册子中所说的"彻底毁灭",因为它从根子上摧毁了共产主义观点。它的基础是什么?这里值得定义一下。

马克思在他的代表作《资本论》中写到贫困、剥削、饥荒和阶级不平等的种种恐怖事情。马斯莫夫写了类似的东西,但马斯莫夫的杰作主要集中在禁闭的恐怖。《绞刑架在工作》和《古拉格群岛》在这点上是相同的。这些是关于监狱的书而不是有关工资的书,有关囚禁而不是有关剥削的书,有关索洛韦茨基修道院和莫斯科塔甘卡监狱而不是有关工厂和农场的书。这些书揭露了共产主义下的监狱体系,沙皇监狱不是萎缩而是发扬光大了。共产主义监狱摧毁从前俄罗斯英雄的整体——不仅是克鲁泡特金的忠诚的读者和追随者而且是孟什维克、考茨基(Karl Kautsky)的读者、社会革命者和其他任何人的那些英雄的整个运动。这是彻底击垮共产主义脊梁的消息——共产主义下的监狱信息,不是揭露无产阶级没有获得幸福生活,即使它是真实的,在共产主义下,无产阶级也不能繁荣。

那么,《中午的黑暗》是什么呢?它是个揭露了这个现实的优美的简单化的寓言。它讲述了一个经典的俄罗斯监狱英雄,在罗贝修福的案例中是在他自己许可的情况下被共产主义者毁掉了。自我毁灭是问题的核心。凯斯特勒给故事塞满了惊人准确的细节。或者至少在阅读《中午的黑暗》时我们本能地相信他确实这么做了。我们读者这样想是正确的。《中午的黑暗》的开头段落,罗贝修福开始估量他的牢房,"牢房门在罗贝修福身后呯得一声关上了"等导致了罗贝修福询问他的牢房邻居的政治罪行的时刻——这些段落表现出独特的可以辨认出来的味道。

在《绞刑架在工作》的 426 页,马斯莫夫记录了他自己进入布尔什维克监狱的经历:

钥匙扭动后,我被带进小牢房。钥匙再一扭动,生活就被留在外边了。我静静地站在门边,不知所措地发呆。

牢房是只有一个窗户的小屋,位于地下室,窗户上有铁栅栏。窗子对着一个院子,对面是一些神秘的仓库。在从门到窗户的墙边是大通铺,上面四对眼睛盯着我看。其中一个属于承受痛苦的,缩成一团的人,呆呆地蜷缩在床板上。看见他让我身体打个寒颤。

- "你为什么被捕?"其中一个问到,
- "因为我在军队的时候拒绝执行警察的命令,提交了书面声明。"
- "啊,…" 其中一个慢吞吞地说 "你倒了霉了。你是什么人,孟什维克还是社会革命党?"
- "不,我是无政府主义者。"
- "无政府主义者!" …他惊讶地说出一句话。"你们这种人也被捕了?"
- "好像是的"我回答说。
- 第二个又问"你说,因为你拒绝,啊,那么,你就完蛋了。"
- 可以说, 凯斯特勒的每个细节都是正确的。

V.

凯斯特勒的大细节也都是正确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阅读《中午的黑暗》,我们肯定注意到监狱文化和恶魔般的专制主义运动的一些接触在沙皇帝国之外的地区确实增加了。最近,我在阅读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巴纳(Hassan Al Banna)的追随者的一些作品,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文学中监狱文化和监狱世界占了多么重要的地位。我们时代的瑞士伊斯兰哲学家塔里格·拉玛丹(Tariq Ramadan)是哈桑·巴纳的孙子,他写了一本主要是献给他爷爷的书《穆斯林复兴的根源》(Aux sources du renouveau musulman)。其中他指出在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独裁统治下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大肆逮捕和监狱经历,描述了穆斯林兄弟会中的恐怖主义趋势。在拉玛丹看来,是埃及的监狱创造了伊斯兰运动中的恐怖主义潮流,他注意到这可以追溯到哈桑·巴纳本人的主张,但拉玛丹的论点没有说服我。

大肆抓人的观点或许有助于构成很容易接受的政治化伊斯兰的反常措施。不管怎样,拉玛丹让读者注意比他自己更大的哈桑·巴纳专家,就是拉玛丹尊敬的谢赫·阿尔卡拉达维(Sheikh Yusuf Al Qaradawi)。我发现谢赫·阿尔卡拉达维用不同的角度看待监狱对伊斯兰运动的贡献。谢赫·阿尔卡拉达维写了一本书,题目是《伊斯兰教育和哈桑·巴纳》,其中他定义伊斯兰运动的最高目标是教育,即塑造新人,伊斯兰意义上的完人。这个理想新人最可能在什么地方产生呢?阿尔卡拉达维写到"监狱牢房看到相互帮助和牺牲的行动,限于篇幅我无法把那些内容写下来。"他回忆起自己亲身经历的监狱生活,对被抓起来的穆斯林兄弟的痛苦感同身受:"许多年轻人没有力量和意志承受监狱的折磨。我就是想让这些兄弟出去,他们都有大家庭,或者不堪忍受这种极端的折磨。"

正如阿尔卡拉达维可能认为的,监狱是穆斯林兄弟会最伟大胜利的地点。接着阿尔卡拉达维的《伊斯兰教育和哈桑·巴纳》在1984年出版了英文译本,在此后的一些年,伊斯兰运动发展出获得无私美德和自我牺牲或者阿尔卡拉达维说的"爱"的更好办法。这是自杀式恐怖主义——其中阿尔卡拉达维是逊尼派伊斯兰的主流神学理论家。自杀恐怖袭击如果不是获得完美无私——绝对牺牲,承担别人的痛苦的成功方法,是什么呢?

同时阅读凯斯特勒和伊斯兰作家让我思考不仅是拉玛丹和阿尔卡拉达维让我们想到的埃及监狱,而且也想到了伊朗监狱。革命



前国王的监狱产生了很多无私的监狱伊斯兰分子,那些拥有崇高美德的英雄。现在伊斯兰监狱包含了他们自己的无私伊斯兰 分子,他们可能成为崇高美德的英雄,凯斯特勒在《中午的黑暗》中如此流畅和简单地描述的难题——具有美德的英雄被其 他拥有美德的英雄迫害的画面,他们在争吵谁最有美德。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故事,不仅仅是寓言而且成为外交政策问题。

在我看来,凯斯特勒非常有趣的生活中最有趣的阶段持续了 15 年,从导致他写伟大小说的背叛共产主义开始。在更早时期,当他是修正版犹太复国主义者时,他知道要追求什么 (犹太复国主义者)反对什么 (犹太复国主义的敌人)。当他 1930 年代早期成为共产党员后,进入了同样简单的世界,即支持共产主义者,反对反共产主义者。但在《中午的黑暗》的作者生活在复杂的世界后,他发现里面有他反对的共产主义者,还有更加紧迫地反对的敌人——共产主义的敌人法西斯主义者。在那些年,他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就是说他站在反对派一边,反对似乎可能产生贫困和不平等的经济制度。

所以,他的敌人没完没了,但他确实知道如何给敌人排序,法西斯主义者是头号敌人,共产主义者是第二位的敌人,资本主义者是名单中更靠后的敌人。他也知道在微妙的秩序中如何接受友谊和盟友。如果保守派具有民主思想,他不排斥与他们结盟,虽然他本来非常厌恶保守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话"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用半个真理来反对整个谎言。"虽然细微差别似乎从来没有让他丧气。在战后他也没有丧失区分这些的能力。他是欧洲社会主义者,在冷战的最糟糕日子他明白反社会主义的美国是欧洲的最佳希望。

凯斯特勒不可避免地发觉自己持有并不受欢迎的立场,或者至少难以解释的政治立场。但他是天才的记者,这意味着不管他的论证多么困难和微妙,他都知道如何用相对简单的术语,用幽默的语言把思想呈现给大众。在记者看来,这些技巧或许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关键。他在解释自己的观点时的快乐似乎给予他足够的力量,对付面前总是出现的攻击。但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迈克尔•斯卡梅尔明智而审慎地描述凯斯特勒的组织活动和争论。

凯斯特勒在 1948 年访问了美国,虽然考虑到他的共产党背景他很难获得签证(这并不是暗示每个非美国作家在进入美国时遭遇签证问题都应该被看作凯斯特勒)。他和《党派评论》周围的一帮纽约知识分子建立起关系,正如迈克尔·斯卡梅尔观察到的,这些作家在国际政策问题上比当时的欧洲同行往往更精明一些。迈克尔·斯卡梅尔提供了《党派评论》知识分子的一些精彩的特征描述(虽然在描述悉尼·胡克是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时犯了非典型错误)。迈克尔·斯卡梅尔回顾,凯斯特勒和纽约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组织了可观的战役,代表自由思想反对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影响下的观点。

迈克尔·斯卡梅尔对凯斯特勒感受到明显的敬佩,这是该传记的魅力之一,在他的热情中,他把很大一部分灵感归功于凯斯特勒本人。我认为他低估了胡克的影响。早在 1939 年,胡克就已经组织了文化自由委员会,他也低估了受到社会主义影响的美国工会的传统,尤其是"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正是这个工会资助了马斯莫夫的《绞刑架在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克的文化自由委员会变成了国际组织"文化自由大会",得到了"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的更多资助,和工会国际局的煽动(虽然最终它也得到中央情报局的资助)。那是劳工和知识分子联盟的光荣日子,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联合起与左右两派的专制主义做斗争。

但是迈克尔·斯卡梅尔在强调凯斯特勒在 50 年代前后在文化自由国际大会以及相关委员会和活动中的积极和有效的角色上是正确的。从 1950 年著名的反共知识分子柏林会议到建立欧洲自由电台和其他跨越铁幕进入苏联地区的努力等活动,不仅是军事威胁和核武器的均衡而且是观点和新闻的争夺。在说服欧洲非共产主义地区的知识分子保持非共产党身份方面,文化自由国际大会及其相关团体好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些工程组成凯斯特勒在他的前共产党模式下喜欢说的"去除信息(Deminform)"。这是文字游戏,"Cominform"指的是共产党信息局,不管怎样,吸取了他 1930 年代初期和中期作为威廉•缪齐伯格(Willi Münzenberg)共产党宣传机构成员的个人经历。这是以火攻火的例子——在知识分子中间用自由派思想对抗共产党宣传,不是宣传而是真实的和真诚的论证。正如我们现在有理由知道的,几十年后,追求民主而不是共产主义确实有很大差异。

阅读迈克尔·斯卡梅尔的描述,我开始对文化自由大会的重大成就后几代人,我们自己时代的知识分子场景感到愤怒。非常奇怪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像文化自由国际大会这样的组织。一场巨大的知识分子辩论正在世界很多地方展开,一边是伊斯兰分子,另一边是反对专制的众多自由派,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但是迈克尔·斯卡梅尔描述的自由派大会或者活动从来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大规模地出现过。我们有人权组织,但我们不再维持代表在那些比如穆斯林兄弟会组织发挥巨大影响力的国家里受迫害的自由派讲话。我们甚至没有那种允许来自不同国家的操不同语言的自由思想的作家聚会讨论各自经验和思想的大会或者会议。我们也没有那种大规模的持久合作的努力把书籍和文章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的语言。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劳工运动的社会主义者胡克、凯斯特勒和他法国同志曼尼斯·施佩贝尔(Manès Sperber)以及1940年代的众多同事走在我们前面。

VI.

凯斯特勒是奥威尔和加缪的好朋友,考虑到在 1940 年代这三个人是世界上探讨专制问题的最伟大作家,这是不同寻常的。他们有理由对其他两位感到怀疑,更不要提凯斯特勒和加缪之间竞争和怀疑的其他理由了,那就是爱上了同一个女人玛曼因•配吉特 (Mamaine Paget)。这个女人成为凯斯特勒的妻子,却和加缪有私情(同时还被爱德蒙•威尔逊热烈追求,她拒绝了让•保罗•萨特的调情,所以肯定是非同寻常的女人)。奥威尔和加缪在 40 多岁就死掉了(玛曼因•配吉特死时只有 30 多岁),迈克尔•斯卡梅尔纳闷如果凯斯特勒年轻时就死掉,他如今的名声是否会更大些。

在我看来,这是可能的。凯斯特勒总是问各种神秘问题,有关灵魂,有关宇宙意义之类,神秘问题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厚重感。但在他的生涯的后期,他试图给出答案时犯下了错误。他开始批评达尔文的科学,追求一种半科学的或者准科学的灵魂学(parapsychology)概念、致幻药品和各种神秘猜测。其中有些作品仍然具有其神奇的魅力,它们或许甚至拥有迈克尔·斯卡梅尔归结为某些段落上的伟大品质。但正如迈克尔·斯卡梅尔悲哀地承认的,灵魂学和其他议题的探索即使在那时看起来就令人怀疑,此后也没有得到更坚实的支持。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时候,凯斯特勒的科学和半科学作品模糊了我们对凯斯特勒本人的印象。

一个伟大作家的最伟大创造肯定是他本人,一个似乎掌握了独特智慧或者特别魔力的叙述者,我们可以从一本又一本书中跟随的他的故事和解释,愉快地相信获得了罕见的令人愉快的东西。奥威尔能够创造我们知道的"奥威尔"这样的人物,就像加缪创造了"加缪"这样的人物。但凯斯特勒开始弄不清"凯斯特勒"是谁了。他或许是自己最可靠才华的牺牲品,他的记者才华是受到大众欢迎的说明。他知道如何认定自己的读者,如何讨好他们,如何关注他们关心的问题和想法,如何找到适当的口吻。这意味着当他为《地平线》或者《伦敦论坛》写稿时,他表现出自己实际上是英国人,当他为《纽约时报杂志》写稿时,他表现出自己实际上是美国人。迈克尔·斯卡梅尔告诉我们凯斯特勒在心态上采用的是英国风格,但他从来没有学会发出"w"音。

他从来不能达到稳定地认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在一本小说中,他回顾了自己的姑姑及其家人在捷克斯洛伐克被捕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杀害的事。但这个事件就像系列类似事件中的一个突出事件一样一晃而过,只是在 100 页左右之后谈到有关犹太教是否种族主义的令人困惑的思考。在犹太人问题上,凯斯特勒游移不定地改变方向,从指导亚博廷斯基(Jabotinsky)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中欧小型民族主义到在他主要著作的最后一本《第 13 个部落》中指导他拥有涉及东欧和俄罗斯犹太人历史的荒谬的反民族主义,最终认为犹太性本身是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对这种误解的消除只能通过犹太人自己拒绝成为犹太人来解决。

我并不是想说凯斯特勒没有能报道纳粹消息或者没有做出可敬的反应。相反,他的反应是别人学习的典范。他把自己最好的文章之一"论不可思议的罪恶"寄给《纽约时报杂志》在 1944 年发表。用精彩的典型的简洁方式描述了试图把令人恐怖的消息传递给充满怀疑的大众所遇到的困难,"呐喊者"的困境。考虑到当时的现实,他认为呐喊是合适的,但是谁知道那种呐喊可能引起不明真相的读者更大的怀疑。他写到"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降低了认识的强度,重要性同样如此。17 是个数字,我觉得亲密地像个朋友,但 500 亿不过是个声音。汽车碾死了一条狗可能打破我的感情平衡,甚至让我们难受地吃不下饭,但波兰 300 万犹太人被杀引起的情绪不过是稍微不自在而已。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认识来拥抱整个过程,我们只能集中在现实的微小一部分上。"

只不过我怀疑,为了说明这个论点,凯斯特勒不得不集中所有精力试图同情地想象无知美国读者的困境。他们是与被杀者在空间上相距很远的人,那样的话他们就没有精力同情地理解自己的困境了。"论不可思议的罪恶"仍然是伟大的文章,但如果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作者"这个呐喊者"是个不会发'w'音的来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这可怕的事就发生在自己家里或像他家人一样的人身上",它将是更伟大的文章。

他对哲学和科学的观点同样迅速和极端地转变,建立在他自己是科学家的愉快幻想基础上。他似乎从来没有认识到为了让自己看着前后一致和有趣,他不得不把自己塑造成正宗的中欧知识分子——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确实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本能。这群人早在沙皇时期,就充满敬佩地看待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监狱殉道者。但中欧知识分子从来不存在于英语国家中,而凯斯特勒更愿意生活在这种国家。世界战争刚一结束,中欧知识分子就从中欧消失了,正如知识分子大部分从苏联消失一样。凯斯特勒本来可能把自己看作最后的莫希干人(这个术语是他本人喜欢用的,他从前喜欢读库柏的作品)但他更喜欢继续陶醉在自己是英国绅士作家是科学家的幻想中。

那么,凯斯特勒是谁?他的读者一直有理由感到怀疑。必须进一步承认的是,最终关于这个人还有比怪异更糟糕的事: 他有令人震惊的故事。他在 1983 年 77 岁时自杀,这行为背后有一个逻辑。到这个时候,他已经遭受严重的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折磨,刚刚被诊断出第二个绝症。他还没有开始承受这双重不幸的真正可怕的后果,他的医生不能预测他还能维持身体功能多长时间,但仍然可以明白的是处于这样状况的人如何更愿意马上终结生命而不是等待漫长的可怕的衰竭。

但是,他妻子也自杀了,在这个事件上根本没有逻辑可以为这行为辩护。她当时 55 岁,身体健康,即使她不采取新的激烈措施,本来能够继续追求有趣的有社交的职业,作为凯斯特勒的遗孀经营他的作品并与出版商斗争。为什么辛西娅·凯斯特勒(Cynthia Koestler)和丈夫一样自杀呢?迈克尔·斯卡梅尔在这个话题上让人感到纳闷地保持沉默。这是事实传记,不能瞎猜。斯卡梅尔带领我们假设,虽然辛西娅·凯斯特勒部分因为她和丈夫早就进入支配和依赖的特殊关系,是性关系但不仅仅是性关系。而且,我能想象(虽然迈克尔·斯卡梅尔就此问题说得非常少,除了注意到凯斯特勒自杀遗书上奇怪的词"自我解脱"外)凯斯特勒提出了他自己的自杀观点。到这时,他已经痴迷于科学骗局。在事实和科学问题上,这个人身上已经不剩下一盎司常识。

迈克尔·斯卡梅尔的传记开头是两人自杀,这是荒诞恐怖的开头。但他还要做什么?作为记者的凯斯特勒肯定非常清楚他妻子的自杀说不清楚,不像他自己的自杀那样容易理解。肯定引起人们对他最后时刻一切行为的怪异的令人不安的怀疑。这两人自杀的事件注定破坏在他漫长的总体上令人钦佩的生涯上残存的一丝英雄品质。但是,一个作家为什么非要为了英雄主义维持自己的名声呢?作家应该是英雄的观念是 19 世纪的另一个遗产,是浪漫知识分子的想法,在俄国,正是这个想法导致了人们对反沙皇监狱知识分子的崇拜。但是凯斯特勒似乎被这种英雄主义毁掉了。在我们自己假装谦虚的时代,被英雄主义毁掉似乎是个美德,虽然它不是美德。这是对自己文学家生涯的犯罪。那么,我们从凯斯特勒身上能得到什么呢?甚至很好地讲述了这个巨大的、一丝不苟的、拥有无穷智慧的书的迈克尔·斯卡梅尔也不知道。

图 2 为 Edmund Wilson 肖像

图 3 为 Irving Howe 漫画像

图 4 为莫斯科以克鲁泡特金命名的地铁车站

图 5 为 Arthur Koestler 肖像

译自: The Prisoner Intellectuals Paul Berman

作者

保罗•伯曼(Paul Berman)纽约大学驻校作家,著有**《知识分子的逃逸》(Melville House)** 本文讨论的书:

迈克尔•斯卡梅尔:《凯斯特勒:一位二十世纪怀疑者的文学历程与政治历程》

Koestler: The Literary and Political Odyssey of a Twentieth Century Skeptic By Michael Scammell, Random House, 689 pp., \$40.

鸣谢:季风书讯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 <u>shrbooks@gmail.com</u>,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